



第 15 期（总 15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 | |
|-------------------------------------|----|
| 继续教育学院成功举办“四川省优秀年轻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三期培训班 | 4 |
| 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学系举办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生态讲坛” | 5 |
| 北京大学两项目入选 2014 年度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 7 |
| 法学院多部教师著作荣获“1974-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 | 7 |
| 第四届“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 8 |
| 北京大学医院向北京光爱学校捐赠衣物 | 10 |
| 【教授茶座第 13 期】王阳元院士谈学习、传承与创新 | 11 |
| 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志愿文化嘉年华 | 12 |
| 校史馆举办“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 | 13 |
| 北京大学举办“依宪治国，与法同行”主题知识竞赛活动 | 14 |

■ 网教之声

| | |
|-----------|----|
| 在线教育核心是简单 | 16 |
| 在线学习习惯未养成 | 18 |

■ 北大人物

| | |
|-------------|----|
| 田余庆：九十自述话治学 | 21 |
| 杨辛：我以泰山喻中华 | 25 |

■ 学者谈读书

田余庆谈《东晋门阀政治》里未能如愿完成的内容----- 32

没有一本一劳永逸的书 ----- 38

■ 好文共赏

再给田老师交篇读书报告吧 ----- 43

■ 史苑钩沉

精神寻梦在北大：老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六） ----- 50

■ 大美北大

镜春园和朗润园今昔 ----- 58

■ 学员心声

千里追寻，只为杜鹃花开 ----- 62

编辑寄语

同学们好，圣诞和元旦双节快乐！期末考试结束，本期燕园网讯在节日期间和大家见面。12月25日，我国史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著名魏晋南北朝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因病在北京离世，享年90岁。田先生缝隙中坚守学术正道，一生潜心于史学研究，不做无独立见解之作，学问“宁恨毋悔”。田先生在《九十自述话治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他非常赏识钱钟书先生的“宁恨毋悔”，即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留有遗憾；有条件写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

本期选了田先生的《九十自述话治学》，以及谈《东晋门阀政治》里未能如愿完成的内容，还有学生的一篇读书报告，以纪念。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鹁、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吴晓风、李文文

新闻动态

继续教育学院成功举办

“四川省优秀年轻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三期培训班

在圆满完成 45 天的学习任务之后，12 月 4 日上午，北京大学-四川省优秀年轻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三期培训班顺利结业。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调研员罗斯文、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舒忠飞出席了结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罗斯文代表四川省委组织部对北大为本次培训工作给予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谢，对学员顺利结业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北京大学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我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干部们来到北大培训学习，可以说是一次珍贵的‘寻根之旅’。”他最后要求学员要将在北大学习到的新知识新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切实

为推动四川省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舒忠飞表示，本班学员纪律严明、求知上进，展现了四川干部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继续教育学院愿一如既往地推进四川干部教育培训事业作出努力。

学院对此次培训班高度重视。在开班之前，学院的领导、老师们与四川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多次就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组织安排等进行沟通，力求精益求精。10 月 23 日，第三期培训班顺利开班，学院党总支书记李胜和四川省委组织部罗斯文出席了开班仪式。李胜希望全体学员尽快实现角色和身份的转换，充分利用北大的教学资源实现自我提升，并表示，学院将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课程、师资和教学服务，全力以赴确保教学质量和培训效果。

在长达 45 天的学习中，39 名来自四川省十几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员们克服了工作、家庭以及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系统学习了“教育制度与和社会发展”“大学运行机制与管理规则”“蔡元培

教育思想与大学建设”“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未来教育”“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等主要课程，同时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当前热点，学习了“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当前世界与中国经济形势”等课程。北大张国有、关海庭、阎步克、周旺生、王俊宜、邓小南、施晓光等一大批优秀学者，都热情参与到本班的教学工作。高水平的授课极大地激发了学员的内生求知动力，他们除了课堂专注听讲、做好笔记，还主动总结心得，不断归纳思考。学员们纷纷表示，在北大听的每堂课都让人耳目一新，引人深思，可以说受益良多，对自己的实际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集中授课的基础上，学院还安排了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班级活动，如西柏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登山锤炼意志比赛等。

“优秀年轻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是四川省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培养中青年后备干部，四川省委组织部与北大均高度重视。截至目前，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已圆满完成了四川省委组织部人才培养计划的第三批培训任务，共为四川省科教文卫、政法、高校及科研院所系统培训中青年后备干部 120 多人，受到了四川省委组织部及参训学员的高度好评。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学系举办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生态讲坛”

12月20至21日，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生态讲坛”在邓祐才报告厅举行。本届论坛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郭正堂等五位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青年生态学和地理学者发表特邀报告，并分别组织了北京大学生态学科教员和研究生的年度学术报告专场。生态

学系主任方精云院士致开幕辞，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曾辉教授主持大会，生态学系全体师生以及京内外多个科研院所的师生前来参加了会议。

本次讲坛分“前沿论坛”“青年论坛”两部分，分别于20日、21日举行。讲坛首日由方精云院士作“北京大学生

态学系 2014 年工作进展”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一年中生态学系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教学等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发表在 Nature 及其子刊（2 篇）、PNAS（3 篇）等著名刊物上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展望了中国生态学科发展的目标和前景。随后，傅伯杰院士、郭正堂院士分别就“新时代的地理学”“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特邀报告。孙航研究员总结了我国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与分布格局，郭庆华研究员报告了由遥感技术进步推动的地理科学方法的革命性变化，张扬建研究员报告了他们对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及生态响应的研究进展。20 日下午，北京大学生态系的老师奉献了 10 个学术报告；21 日的“青年论坛”主要由生态系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进行报告，参会专家学者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两天的学术报告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从分子生态、植物生理生态、植被生态、碳源碳汇到生物地理、气候变化、生态遥感等，跨越多个时空尺度的生态格局与过程。报告期间，各位受邀专家与参会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会场爆满，气氛热烈。

讲坛吸引了京内外 27 个科研院所 340 多位师生的自发参加，到会者包括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青藏高原研究所、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等单位的师生，还有《生物多样性》和《植物生态学报》编辑部的代表。参加讲坛的师生表示，北大生态讲坛是一年一度的学术盛宴，前瞻的科研理念、创新的研究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人获益匪浅。

“北京大学生态讲坛”于 2004 年创建，十年来从未间断。建设初期，讲坛旨在为生态系师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对外交流，提升科研综合实力水平。而今，该讲坛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已逐渐成为国内生态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讲坛，对中国生态学多个前沿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并努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学术理论方面的支持。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舍予

北京大学两项目入选 2014 年度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评选的 2014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日前在京揭晓。经过形式审查、学部初评、主任办公（扩大）会终评和项目公示，10 所高校科技项目获评本年度高校科技十大进展。

由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人工微结构与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龚旗煌院士担任负责人，浙江大学为合作单位的项目“单个纳米颗粒光学检测新原理研究”，由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梅宏院士担任负责人，南京大学为合作单位的项目“网构软件理论、方法与技术”榜上有名。

其他入选项目还包括第二军医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燕山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 8 所高校所牵头申报的项目。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评选自 1998 年开展以来，至今已举办 17 届。这项评选活动对提升高等学校科技的整体水平、增强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法学院多部教师著作荣获“1974-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

11 月 30 日，由凤凰网、法治周末报社共同策划举办，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的“法治的突破：1978-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致敬盛典”在深圳福田会堂举行，法学院龚祥瑞教授著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沈宗灵教授著作《比较法总论》与朱苏力教授

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荣获“1974-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

本次活动历时一个多月，中国法学界享有盛誉的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担任评选顾问，由张文显、王利明、付子堂、何勤华、季卫东、孙笑侠、张守文、许章润等 25 位著名法学家组成评选委

员会，在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基础上，经过严格筛选投票，从 108 本初选书目中选出了 30 本“1978—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以及 10 本荣获“1978—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的书目，旨在褒扬三十多年来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启蒙作用，对法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有重要作用，并为法治研究及法治文化普及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及其代表作品。

长期以来，法学院教师积极投身法律学术研究，出版、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为相关法学领域开创了崭新局面。在本次评选活动最终获奖的十本图书中，有三本是法学院教授的著作，而同时获奖的李步云、季卫东、夏勇等著名专家学者也是法学院毕业生，彰显了北大法律人的学术影响力和对中国法治建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接下来，法学院将继续不断完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的步伐，着力培养高水平法律人才，为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1974—2014 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获奖书目

《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编辑组）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龚祥瑞著）

《比较法总论》（沈宗灵著）

《法治论》（王人博、程燎原著）

《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梁治平著）

《走向权利的时代》（夏勇主编）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朱苏力著）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王泽鉴著）

《法治秩序的建构》（季卫东著）

《论法治》（李步云著）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第四届“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12月13日，第四届“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

杰交流中心星光厅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

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 40 名师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医学与人文研究院张大庆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首先致辞，他强调“北大理科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科技史，对北大理科史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现代科技史以及塑造北大形象而言都意义重大。许智宏建议，理科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新中国之前的北大理科的发展情况，也要关注建国以后的北大理科发展情况。理科史的研究工作对发掘北大传统的科学精神、研究精神、批判精神非常有价值。

随后，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院士致词。高松院士首先充分肯定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中心作为文理交叉的学术平台应该承担起重要的职责。他指出北大理科史的工作目的是认识自身，认识科学，认识北大。高松建议，理科史的工作应该更有系统，更有规划地做出一些整体的梳理，应该从学科内部的角度，以及学科间的相互联系的角度做一些具体的工作。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成立 120 周年之际，从整体上评

价北京大学在科学技术方面对祖国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开幕式后，16 位学者分四场作了精彩报告。胡大年研究员利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珍贵档案，揭开了周培源先生与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森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不仅展示了周先生的高尚品德，并回顾了当时中美科学的交流情况。再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郭建海研究员通过丰富的史料，使我们看到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科技社团——北京大学数理学会，对了解国人当年在现代数学、物理学领域的学习和研究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正是有一批像武际可先生、谈庆明先生、潘云唐先生等老北大人的积极参与，会议才更加精彩，更富有历史感。

闭幕式上，张大庆首先感谢了各位参会的学者，正是由于有更多关注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的专家学者加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让人们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与这所古老学府的关系。张大庆说，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每年都有进步和提升，还需更加努力才能使研究系统化。对理科史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要在学科建制等整体方面做出

历史的评价，这对于将要迎来双甲子生日的北京大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北京大学医院向北京光爱学校捐赠衣物

12月15日，北京大学医院向位于顺义区的北京光爱学校捐赠过冬衣物和书籍，为光爱学校的孩子们送来温暖。

在此次捐赠活动中，北京大学医院组织医院员工集中捐赠了316件衣物、100余册图书。12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医院副书记、工会主席朱建华一行带着全院职工的爱心和物品前往北京光爱学校看望在校学生并进行捐赠。光爱学校负责人汪老师代表所有孩子向北京大学医院的全体职工的捐赠表示感谢，并向医院颁发“光爱捐赠证明”。

这次捐赠活动由北京大学医院口腔中心护士王红叶倡议并具体联系。王红叶长期在光爱学校等慈善机构担任义工，利用节假日帮助有需要的特殊儿童。北京光爱学校目前在校的有90多名“特殊儿童”，这些孩子有的是孤儿，有的是被家庭遗弃的孩子，有的是因家庭极度贫困而无法抚养的孩子，还有家庭成员全部在外的留守儿童等等。他们的一切生活来源及接受教育的资源，均依靠社会捐赠。医院工会和团委将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关注光爱学校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教授茶座第 13 期】王阳元院士谈学习、传承与创新

2014 年 12 月 3 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主办的第 13 期“教授茶座”在北京大学新太阳学生中心 224 室举行。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王阳元院士与通过“燕园学子微助手”微信平台报名的 16 位学生围绕“学习、传承与创新”展开交流讨论。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德英等老师参加活动。



王阳元首先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讲述了他在见证北大变迁的过程中，对“学习、传承和创新”意义的深刻体会。他认为学习是人生命中不竭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传承文化，也要勇于创新，因为创新是一切价值流的源泉。他表示，“我很羡慕同学们，羡慕你们的年轻，羡慕你们赶上了历史机遇期。你们是祖国的未来、社会的希望，你们的一生注定要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

业联系在一起的。将来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你们所做的事情，都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有同学问“大学阶段应如何学习”。王阳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学贵心悟，人贵执着。学习是人必然经历的终生任务。”他认为，学贵心悟，“悟”它的规律和本质。如何“悟”呢？除了听课，讨论是非常好的方式，而且要宁静地思考。

一位同学针对王阳元的研究领域对中国微电子产业的创新、突破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王阳元说：“发展未有穷期，奋斗永不言止。”他对中国未来的微电子产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并相信这些跨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地方最有创新点。在他看来，“风起于青萍之末”，选择读研、做产业都是一个目标，就是创新，创新是价值流的真正源泉。

有同学对“如何培养创新能力”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王阳元指出，国家首先要支持产业创新，同时要坚持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原始创新；建立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的机制，建立吸引创新型

人才的机制。而对于个人来说，创新的形成则要经过“系统的科学研究”，要“破除思维定势”，培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后一点上，他认为北大“常为新”的理念和宽容失败的气度使他受益匪浅。针对科学创新中的开放问题，他强调：“基础研究要和其它国家互相交流才能有所发展，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我们主张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既要开放又要自主，这要针对不同问题掌握好度。”

有同学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提出了疑问。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王阳元谈道：“文化对于提高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以及处世态度很有帮助，同学们在学校里最可贵的就是要‘宁静致远、淡泊名利’。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应当被广泛接受。”

在活动的最后，王阳元为同学们写下寄语——“学贵心悟，人贵执著”，表达了同学们的期望与要求。他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善于领悟，把自己的一生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在执著追求的过程中实现梦想。

“教授茶座”是知名教授与青年学生分享成长经历、共话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由学生工作部于2014年春季学期创办，至今已举办13期。今后，学生工作部将继续邀请各领域的知名教授做客“教授茶座”，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也将通过“燕园学子微助手”微信平台等途径发布各场次活动的报名通知、新闻动态和“教授茶座”微语录。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志愿文化嘉年华



今年12月5日是第29个国际志愿

者日，北京大学第二届志愿文化嘉年华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广场举行。本届志愿文化嘉年华由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北京大学学生会承办。活动以“公益无处不在”为主题，

展现了北大学子“用我智慧奉献爱”的良好风貌。

冬日的燕园，寒风挡不住北大志愿者的热情。北京大学本部、医学部等 32 个院系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公益类社团参与展示，并邀请了 26 个社会公益组织走进校园。展示涵盖了支教活动、校园志愿服务、环保活动、义卖募捐以及扶弱助残等各个领域，并通过照片展、趣味游戏、现场体验、有奖竞猜等生动的形式展示团队文化，使学生们体验到了志愿服务的魅力。

志愿文化嘉年华活动集公益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吸引了大量师生的参与。各个志愿团体吉祥物的助威、写满正能量的签名墙，为现场增添了温暖气氛。通过参观展览、倾听讲解和亲身体会，学生们增加了对各志愿团队的

了解，加深了对的认识，并为“最受欢迎的志愿团队”投出了宝贵的一票。



本次志愿文化嘉年华拉开了 2014 年北京大学第二节志愿文化节的序幕。在本月中，还将举办 2014 年 APEC 志愿服务总结分享会、十佳志愿服务集体和个人表彰会等活动，向全社会展示北大学子们丰富多彩的志愿文化成果。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校史馆举办“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7 至 1924 年，曾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24 年辞离北大后，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

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后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并任社长。1947 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论著汇编为《梁漱溟全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漱溟先生应邀来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4年9月，在梁漱溟先生亲属的鼎力支持下，北京大学校史馆“书生本色 学者风范”系列专题展览推出“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展览分为“开明家风 自主学习”“究元决疑 出佛归儒”“知行合一 致力乡建”“忧国忧民 奔走国事”“忠厚传家 物来顺应”五个部分，以160余幅历史照片以及梁漱溟先生手迹、著作及生前所用之实物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梁漱溟先生自学奋进、精研佛儒、潜心教育、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不懈实践探索的一生。

展览于2014年9月12日起在校史馆地下一层专题展厅展出，每周三、五、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至下午四时三十分对外开放。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北京大学举办“依宪治国，与法同行”主题知识竞赛活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基础性地位，为弘扬宪法精神，构建法治校园，在12月4日首个全国宪法日暨第14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当天，北京大学学生会、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于28楼北举办了以“依宪治国，与法同行”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和签名活动。



参与活动的同学们先随机抽取宪法知识相关的题目，进行作答，随后在签名墙上写下自己对于“依法治国”的

理解和对建设法治校园的期望。有同学写道“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要更好地发挥宪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有的同学认为要“加强违宪审查，将宪法精神落到实处”。与此同时，由校学生会微信平台推送的线上答题也在热烈地进行。不时有同学赶到竞赛现场，按照微信指示领取宪法日纪念明信片，并在签名墙上留下自己的感想和体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建设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北京大学加快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步伐，学生会将开展一系列法制宣传活动，号召更多同学从自己做起，参与到法治校园、法治中国的建设当中。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网教之声

在线教育核心是简单

前言：言及在线教育，三句不离效果；言及效果，三句不离门槛，在线教育的核心真的是效果吗？如果在线教育核心依然是效果，那么谈何颠覆或者改革？线下教育与在线教育革命的是简单，而非效果。

不久前，笔者曾在朋友圈咨询过什么是在教育的核心，得出的答案不出所料是效果。只是线下教育与在线教育殊途同归的是效果，可是核心还是效果的话，那么变革不是一个笑话吗？笔者认为的是简单，而非效果，从五个层次由高到浅论简单核心。

如今，整个教育系统可有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组成，而在线教育与线下教育也自成系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其实线上系统与线下系统差异集中在下面几个部分：

前者公开透明，后者遮遮掩掩；前者扁平化，后者圈圈相加；前者技术，后者关系；前者目标明确，后者参差不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系统简单是如何成为在线教育核心一部分？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打造一个在线教育系统；与借助人脉与地域差异性，打造一个线下教育系统。而两者间差异在于系统简单透明，前者系统一目了然，后者的系统像黑洞般。众所周知，传统教育系统玩的就是资源与人脉，而且成立一个教育机构要跟两个口打交道。但是线上教育系统创建简单，不如也不会有每天新增在线教育机构 2.6 家的数据统计。

在线教育系统简单核心造就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这部分力量不断的冲击着系统，改造系统。如今教育变得如此简单，会追求产品的极致体验。在线教育产品一直在追求高标准，能够超出消费者期望产品。而且在线教育的产品结合互联网，自然而然带来适应性与吻合度。如果摆着消费者免费的是两个系统，而尝试过在线教育系统的消费者更加倾向于在线系统。过去，线下教育机构的一套套的流程以及操作，一直让消

费者质疑。可是现在有着一套更加透明以及可见化的系统，你说消费者更加倾向于谁？消费者是个体，是群体。如今，教育机构还是把消费者当作以往思想以及行为下的消费者，逃离是迟早的事情。

身份简单

学员参与线下教育机构培训课程，一般都会被冠以某个学习团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圈子。但是对于他们而言，重点不是什么身份，而是学习。而且身份带来影响还有很多，比如如果知道某学员是某个教育机构的学生，那么其它教育机构就会做精准的服务，有时候会让学生很烦恼。

学生们参加培训，目的是取得该有期望，简单的去学习，而非陷入各种竞争当中。相反，学生参与在线教育学习，他们会的身分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另外一个他们有了选择的权利。

信念简单

为什么一个培训课程要上千，而线下课程就需要上万？高昂的价值生生剥夺一部分人提升学习能力机会，也生生让教育变得不平等了。而在线教育普及型与低价，能够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参与到学习中，告诉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成功，每个人都是学习天才。

一代代的人坚信一个教育模式，他们就会产生出无限动力与变革的力量。传统授课课堂，学生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大胆提出，而在线教育课堂反而让学生变得肆无忌惮，同时让老师知道学生那点需要改进，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老师不断的提升教学质量。只要学生经过在线教育学习，就会对传统课堂产品一种潜意识的厌倦，因为互动、尊重的信念已经灌输给他们，让他们进行审视。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线学习过，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学习可以如此简单，不需要太高的能力支撑学习，一切都是完全是科技化。在线学习，学员很简单，只能需要学习能力，其它都不是他们需要。分析自己日常错误，可以通过软件；找出自己下步建议，可以软件数据分析；复习知识点，网站有大量的同类知识点；做题练习，有大量的题目；想要听课，每天都有课堂讲解，听不懂还能够重听，学员只需要学习就行，一切的能力都简单化，一切的能力都集中在学习能力，教育本身就是学习。

环境简单

在线教育的环境没有那么圈圈道道，尤其是国家鼓励互联网创业，更是大放绿灯的情况下。从上而下，国家开放，教育体制改革，或许古往今来从来

没有一个时代如现在如此简单，简单的做教育。另外国内 A 股的开放与国外股市青睐国内教育的时候，在如此一个环境下不发展还等什么时候。

作为在线教育而言，发展是必要前提，最终的目地还是提升国人素质水平。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法脱离环境的影响，复杂的环境下会造成行业相当大的变

动，而对于教育而言，变动就以为变革，教书育人是一种大事情，所以不能把环境复杂化。一个清澈的水塘或许不能养到很多鱼，但是一个黑色的鱼塘也不能养出好鱼来。

作者：黄嘉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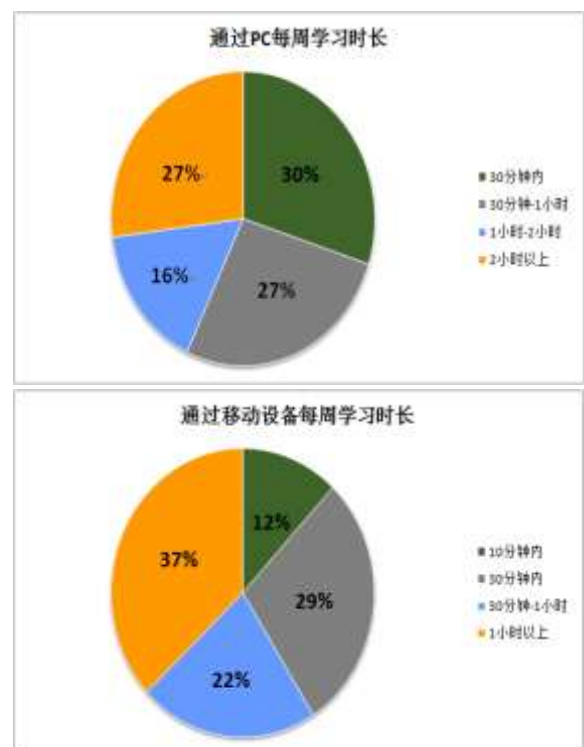
来源：搜狐 IT

在线学习习惯未养成

近日，腾讯精品课发布《2014 年中国在线学习用户行为调查》，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在线学习用户的调查分析，把脉 3.6 万在线学习用户的学习行为习惯。通过调查发现：6 成在线学习用户每周学习时间不足 1 小时，绝大多数用户选择在晚上学习，家中依然是最集中的学习地点。

报告显示，6 成的用户每周在线学习时间不足 1 小时。PC 端调查显示，30% 的用户周在线学习时长少于半小时，而 27% 的用户周在线学习时长则超过 2 小时，在线学习时长呈现“两极化”；移动端调查中，41% 的用户周在线学习时长不足半小时，12% 的用户甚至少于 10 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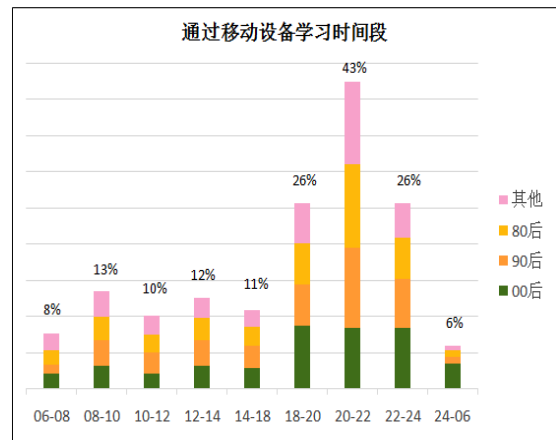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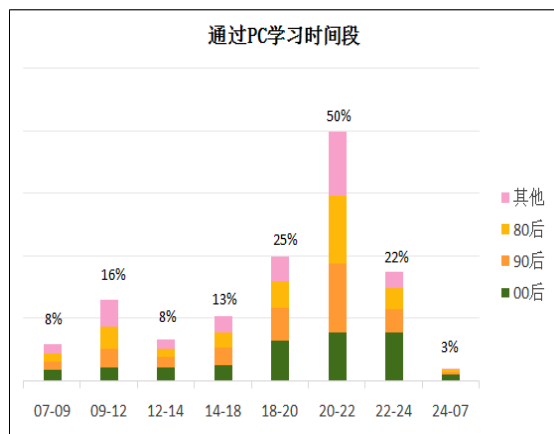
可见，用户对在线学习的认可程度和接受程度不尽相同，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在线学习并未成为主导学习方式，用户的在线学习习惯还远远没有养成。



学习时段：用户多选择晚上学习，集中化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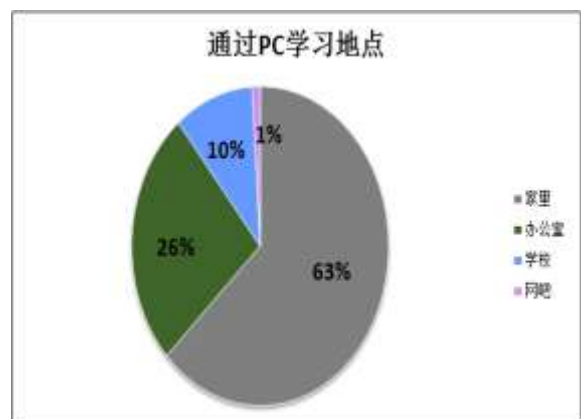
报告对在线学习用户的学习时长也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线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实现碎片化学习，使知识的获取更为灵活便捷。

尽管在线学习可以满足用户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但报告数据显示：用户学习时间的“集中化”趋势明显，每天的 18:00-24:00 是用户集中学习的时间。其中，20:00-22:00 是用户学习最为集中的时间，综合多个年龄段来看，这一时间段的“集中化”分布情况分别是 PC 的端占比达到 50%和 移动端的占比达到 43%。



报告对在线学习用户的另一个维度调查是学习地点。根据调查显示，对于在线学习用户来说，无论是 80 后还是 00 后，家中依然是最集中的学习地点，其中 PC 端用户占比 63%，移动端用户占比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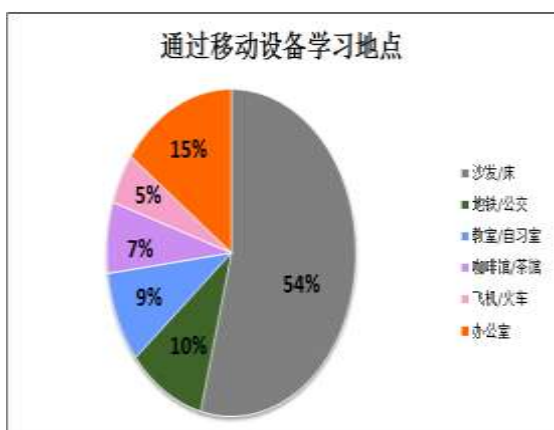
此外，有近 4 成 PC 端用户选择办公室、学校作为学习地点；对于移动端用户来说，办公室、地铁/公交以及教室等也是在线学习的聚集地。鉴于移动因特网的普及和近两年各类学习 App 的快速发展，移动端在线学习的潜力不可小觑。



在线教育市场虽初具规模，但在线学习用户的学习习惯还尚未形成，这在一方面也凸显了在线教育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另外，如何让线学习用户在下班后的家中学习体验更好，如何在用户沉默

的指尖创造更多的价值，是未来教育产品更新迭代所必须要考虑的。

来源：腾讯教育



■ 北大人物

田余庆：九十自述话治学

我青少年的时候，颠沛流离，未能获得稳定的求知环境。平凡的家庭未曾给我书卷习气的熏陶。那时是抗战第一，个人成长也是时刻心系民族存亡。后来流亡到大后方，碰上逐渐兴起的学生运动新潮流，青年人忧心国事，痛恨腐败政治，自然被潮流吸引。

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在缝隙中获得的。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来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

我起初的落脚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此时我已经转而专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国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辈的指点下被安排参加近代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历史系的断代史教学工

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课程。

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

学校也有科研任务。中国史的科研，风向所指，一是学术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批胡适，但持续时间不长；一是意识形态强烈的五类课题的讨论，向达先生谓之为“五朵金花”。批胡适，我被邀约，写过批判“实用主义考据学”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当时自己是初生之犊，以无知而忝列“新生力量”，但心里并非无畏。

我自知所懂甚少，跟着风向在政治上上纲上线，折腾一番，学术意义是谈

不上的，运动过后，事情也就忘了。没想到隔了近半个世纪，谢泳先生著文涉及旧日批判胡适一案，顺便说到我，说我当年所批“实用主义考据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就是我自己后来治学的门径。谢先生的中肯批评使我自感惭愧。

关于“五朵金花”一类课题的研究，当时搞得热闹，我也不甘寂寞，暗自跟进，只是尚无把握，不敢张扬。我把范围选定在阶级斗争（实指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在社会形态转变中的作用这个方面。这并非新鲜问题，要想出点新鲜见解并不容易，搞不好很有可能被指责为异端。所以我着重找马恩语录来做支撑，写成了几万字的草稿，尚未完成。

正在此时，学校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被列入北大全校所谓批判“党内专家”（这是北大某领导人自创之词，意指以专家自恃的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什么专家）一案。那时风云骤起，被批者和批判者都不甚明白这一案是怎样搞起来的，反正是乱砍乱伐，上纲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披着理论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批判毫无理性，残酷无情。最让我吃惊的是，校领导在总结此案的大会上，竟说出如果党员中有谁再搞修正主义，

就休怪下手更重的威吓语言。我预料还将在党员教师中找所谓披着理论外衣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靶子，而我手上那篇未完成的文稿正适合批判的需要，于是就此机会偷偷把它烧掉，避免后患，心想以后决不再涉此类课题。

下决心一烧了之，还有一个较深层的思想背景，就是批斗并没有让我明白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北大领导在总结此案的大会上训斥我们，气势很足，只是也没有说出什么是修正主义的话来。后来有点明白，就是越“左”越好。

在等待发落的过程中，我为了汇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取毛选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写成一篇歌颂农民战争的文章，调子很高，《新建设》杂志印成大样，准备刊出。稍后形势变化，大局调整，舆论随之降温，文章没有出炉。这一在被扭曲心态下写下的表白性的违心之言，既误人又伤己，如果发表出来，成为我自己学术档案中的一页，将会是我永远的内疚，比起当年由于无知而乱批“实用主义考据学”，性质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在全国调整时期，我在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教材这项上面抓得很紧的任务中，潜心编写古代史的两大

段落，利用时机补读了一些早该阅读的书籍。这是难得拥有的平静思考而又感到充实的几个年头，翦先生是非常关切我的长者，理解我的处境，对我调适心态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只是他无从理解他自己的处境，不久以后就陷入大灾难之中，令人悲愤不已。

这几个年头，是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反思过程，也是认识深化过程。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不能只顾眼前。如果以务实求真为目标，真正做到以我手写我心，错了改正，这样的学术工作才能心安理得，才是为学正道。

我按照独立思考、务实为学的信念，改变过去浮华的路数，设想沉潜做专题研究工作，逐步推出专题研究课程，酝酿写出研究文章和著作，重新开启自己为学之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没等到迈开脚步，“文革”一来，一切变样。不过有了这几年的沉思和历练，学术理念已较为明确。只是所设想的为学之路暂时受阻，等形势稳定后再说。

几年理性反思使我脱离了过去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成熟了一些，懂得随

波逐流的错误和危险。因此，我在十年“文革”中多少能理性地判断方向，谨慎从事，避开一些风浪，少栽一些跟头。这里我举与学术有关的两项事例。

正当外间盛传“劝君莫骂秦始皇”诗句的时候，军宣队带同出版社的人，找我写歌颂秦始皇的书，作为政治任务，要得很急。我知道此事有来头，不容说不。他们要的是政治，不允许两点论，学术水平不太在意。我处在困难中，只有拖延一法。拖到出书失了时效，才被允许改为写一篇论文，要在《北大学报》复刊号上刊登。

文章写完了，虽然重在歌颂，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两点论。军宣队的干部会上放出话来说：“北大居然还有人坚持骂秦始皇是暴君！”言外之意大家懂得，好心人为我担心，让我家人考虑眼下利害关系，劝我不要再顶牛了。

我当然非改不可。怎么改呢？我想到如果只图现在过关，时过境迁之后，有人以此责备我涂抹史实歌颂农民所反对的暴君，我能规避文责吗？所以我只有斟酌分寸，删除了部分内容，在文末另加小段文字，表明秦始皇历史贡献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对此不予评论。

这样，妥协达成，《北大学报》登出了这篇艰难曲折中写成的平淡文章。风波过去了，我逃过一劫，避免了背负自责的包袱，舆论也能理解我的苦心。事后回思，我把那时能侥幸争得这种妥协视为自己坚守务实为学的小小的得意之笔。

务实为学，还有一个事例。在评法批儒高潮中，我被约为《历史研究》复刊号写文章。

此时曹操作为法家皇帝正被热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还有点话可说，于是写成《袁曹斗争和世家大族》一文。

审稿过程中，风闻有较强烈的责难，我没有太在意。我猜想责难可能是在曹操兴于法而终归于儒这一见解上，这一学术见解如经恶意歪曲，可能触犯大忌。但我知道，按曹操情况，不崇法不能起家，不入儒不能治国，此见解既有史料根据，又有前人研究可供参考，所以我敢于坚持。

此文刊出时用小字排印，附在一篇大字排印的工农兵群众歌颂曹操文后，可以被理解为一篇供批判用的反面文章。我当时对此有点懵懂。后来全国政治大局有了急速转移，舆论重心随之大变，此文居然躲过批判。

多年以后，清华的刘桂生教授告诉我他所知审查此文的幕后情况，颇为详尽曲折，也算是我所知关于此文的一点小小掌故。曹操一文的论点、思路和方法，实际上都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这在当时并不是自觉的，却对自己以后的学术工作长期起着作用。现在我把此文选入本卷书中。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学术上重新上路时，自觉还略有余热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误。

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

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

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我是以教书为乐的，所以我把备课与科研结合起来，教学促科研，科研为教学。我觉得这是我发挥余热的合适而有效的途

径，我循此走过十好几年。后来一场大病剥夺了健康，教课暂停，科研还勉力维持，只是节奏慢了下来，思维能力退化。八十之后，沉潜的研究是全无力气了。

勾勒自己的学术人生，觉得在学术上能发挥一点光和热，主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为时已经不早了。1991年我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说：

十余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注：这是指杨绛先生为《围城》出版事问钱钟书先生的话，当时为避攀附之嫌而未举名字)，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有遗憾；有条件写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

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我用旧日写的这段话来结束新的自序。我想强调一下其中的关键词，首先当然是“宁恨毋悔”。此外，“晚学之憾”和“自知之明”也要强调，“晚学”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学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这是我的愿望。

本文原是《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的自序，收入《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

来源：澎湃新闻网

杨辛：我以泰山喻中华

杨辛，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美学家。1922年5月生，1947年肄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长期在北京大学从事美学教育和研究，1960年至1988年任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1989年至1990年任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华美学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全国高等学校美学研究会副会长。

199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获得中国美术家协会“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2012年，获得“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杨辛和甘霖合著的《美学原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广泛的美学教材之一，至今已重印40多次。近日，《中国文化报》记者杨晓华在北京杨辛先生寓所对其进行了采访。




杨晓华：从1979年首次登泰山以来，您坚持登泰山，一往情深，老而弥笃。您和泰山为何有如此深挚之缘分？

杨辛：中国文化哺育的每一个人都和泰山有着一定的精神联系。我们从记事起，就不断听到“稳如泰山”“安如泰山”“泰山压顶”“泰山北斗”“有眼不识泰山”“一叶蔽目，不见泰山”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熟语，泰山作为一种精神基因，已经深深嵌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之中。在汉语的古文字中，泰与“大”“太”同义，在中国人看来，泰山几乎就是“平安”“伟大”“崇高”的同义词，所以孟子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1979年，中华美学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和武汉大学的刘纲纪教授同游泰山。在岱顶，我们晚上住在2元钱一宿的简陋棚子里，但是第二天清晨，我们看到了一生中最为壮丽辉煌的泰山日出，激动不已。从此，我被泰山的雄伟深深折服，每年坚持登山，有的年份不止一次，到现在总计42次，其中徒步登山37次。80多岁以后，我坐车到中天门再往上登。今年我还准备再去。每一次登山，我都经历一次精神的沐浴和更新。如今虽是92岁，仍然觉得心志顽强，精神不老，这和泰山给我的激励直接相关。

杨晓华：不仅是登泰山，作为一个美学家，先生还参与到了泰山文化的研究、创造和发扬之中。先生认为泰山是“华夏之魂”。中国的名山大川为数众多，各有千秋，为什么先生独对泰山有如此崇高的评价？



杨辛：早期我登泰山，主要还是从亲近自然，怡情悦性的角度感受泰山。1986年，泰山准备申请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北大受命进行学术论证，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我负责美学方面。1987年泰山申遗成功，我们的报告被联合国专家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好的一份。正是在准备报告期间，我有幸从不同路径、不同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和体会泰山，我对泰山的认识、超越个人的心志体验而进入学术文化的梳理、鉴赏和阐发当中。

我认为，在自然美中有两种美的类型，一是壮美，一是优美，或称作“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泰山是阳刚之美，这种阳刚之美具有自然风貌的基础：泰山“拔地通天”与周围平原丘陵形成强烈对比；泰山山势累叠，如大海巨澜，从一天门到中天门再到南天门，一浪高过一浪，气势磅礴，节奏鲜明，《诗经》中以“泰山岩岩”状之，实乃传神妙语；泰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巨大雕塑，基础宽阔，形体浑厚，沉雄稳重，可谓“泰山如坐”；泰山以坚硬的花岗岩为主要岩体，巨石交叠，形貌多姿，赫然矗立，动人心魄；泰山的苍松郁郁葱葱，虬枝峥嵘，占谷为林，顺风成韵，美不胜收；泰山的万壑烟霞呼吸

天地，流动嬗变，清代叶燮形容是“天地之至文”。

泰山的壮美虽然以自然美为基础，但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的凝结和丰富。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宏大构思，道路、溪水与山谷的妙合无垠，人文营构与自然景物的浑然一体，这一切一方面深化了泰山壮美的主体风格，另一方面增加了泰山娱人怡情的玄机 and 妙趣，使得泰山具有了天、地、人亲密无间，相互依仗，相互激发的空灵和博大的境界。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魂。”这是我对泰山最见性情的描写。这首诗被做成泰山的摩崖石刻，据说在当地已经广为流传了。

杨晓华：您还认为人们对泰山的审美方式存在历史的阶段性变迁。

杨辛：这种变迁经历了“自然崇拜”“比德”和“畅神”三个阶段。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民智未开，自然神秘而庄严，人们对大山的伟岸、雄壮和气象万千产生深深的敬畏，人们希望从山的恩赐和保护中获得财富和力量，泰山因为结合了太阳崇拜，具有了更加崇高的地位，连汉武帝刘彻都对着泰山击节赞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

“比德”作为一种观物方式，在春秋战国就较为普遍。《诗经》中的比兴，《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即是明证。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因为山的安稳厚重和仁者的敦厚相似，大山蕴藏万物，好比仁者施惠于人。在这种关照中，山的特点和人的精神世界互相映照，成为伦理秩序和文化力量的象征。

在前两种认知中，都存在一定的审美空间，但是审美是依附性的，自然和道德威严还有可能造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恫吓和压制。大约在魏晋时期，中国的审美意识逐步走向独立。曹植《飞龙篇》云：“晨游泰山，云雾窈窕。”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审美世界。唐代杜甫《望岳》云：“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已经从自然审美的激发中产生了人生体验的豪迈和超越。南宋宗炳所谓“峰岫峣嶷，云林森渺……万趣触其深思……畅神而已”。当然，在历史上这三个阶段是相互交错的。

杨晓华：泰山被定为“五岳独尊”，这种地位有着明确的典籍根据吗？这种地位的获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文化的？

杨辛：泰山又称东岳，在五岳当中，海拔是第三位，它之所以获得“五岳独尊”的地位，主要是历史文化的缘由。中国人崇拜太阳，太阳温暖、光明，普照人间，滋养万物。泰山耸立于齐鲁平原，东临苍茫大海。海上日出，泰山之巅是想象中最先可以观瞻到的地方，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对太阳的崇拜转化为对泰山的尊崇。《史记集解》载：“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这种尊崇，后来就导致帝王封禅，泰山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记》记载，在秦始皇之前就曾有72个帝王在泰山祭祀。帝王的祭祀活动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泰山崇拜心理，一般学者认为，最迟在汉代，五岳之说、泰山之尊就确定了。

依我之见，泰山的文化内容包含丰富，意蕴深刻，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人文价值可以探究。首先从政治而言，泰山通天接地，是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象征，是政治清明、国运昌盛的表现。其次，从哲学上讲，泰山构筑了天人交契的博大时空，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民族生命力的象征。第三，从伦理学上讲，泰山包容万物，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华民族厚重、宽容的人格精神。第四，从美学上讲，

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整体呈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具有宏伟远大的气魄。从这几方面考察，泰山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和黄河一样，象征着中国人民的伟大、质朴、刚健、进取、智慧和坚韧。

杨晓华：作为学者，您超越了普通的游嬉心态，对泰山文化的绎解丰富而深刻，您还身体力行参与到了对泰山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之中。我想知道，就您个人而言，是什么使得您如此动情地亲近泰山、颂扬泰山？

杨辛：前几年，我和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同去泰山。清华建筑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您可否用一个词来概括泰山对您的最深刻的影响？”我竟一时凝塞。后来还是从哲学上想到，这个词应该是生命的“生”。

泰山文化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天人之学，其最大魅力就是能激发人的生命力。对个体和国家皆是如此。儒家经典《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日生。”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使万物生生不息，人要向天地学习就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泰山的因缘改变了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

在泰山，最惊魂摄魄的体验就是观泰山日出。泰山日出不是温和、秀雅，

以妖娆示人，而是在天风莽荡、云涛汹涌中腾跃而起，喷薄而出，刹那间光芒万丈。这是一曲壮美的生命的赞歌。李白观其大美而言道：“平明登日观，举首开云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我登泰山共有七八次看到日出，其中只有两三次看得最充分。

不仅是日出。还有泰山松，其生存条件最为酷劣——泰山是坚硬的石头山，缺少泥土。泰山松生长在石缝中，破石为土，云雾作乳，硬是从石头缝里的贫瘠泥土中汲取营养而生长。“泰山第一松”“迎客松”“卧龙松”等造型奇特，征显自然生命力之顽强。

泰山挑山工，则是人文存在中最直接的显象。他们是泰山孕育的优秀子民，“性实在，不谈空；步步稳，担担重，汗如泉，劲如松；顶烈日，迎寒风，春到夏，秋到冬”。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有一段我疾病染身、形销骨立，体重只有 43 公斤，甚有颓唐萧瑟之感。但是我坚持登泰山、感受泰山，向泰山学习，十分幸运地走出了生命的低谷。

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气象熏陶和激发了我的生命活力，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激励了我的学术、文化生命。我的美学思想，书法、诗歌作品，超越桑榆晚境

的囿限，得有持续的精进和升华。我为泰山写了30多首诗歌，新出版的《全泰山诗》即选了29首。我有诗云：人生七十也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九十枫林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生命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似如圆周运转，不必设定终点，任何一点都可以是起点。即使个体生命结束了，也可以融入大千宇宙，与日月同光，天地同寿。

杨晓华：无论多么高深的哲学思想还是丰富的文化意蕴，作为一座大山，这一切都只有在登临之中才会有真切的体验，这应是您不断攀登的原因所在。

杨辛：的确如此。泰山文化是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认为，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融合得这样好，是中国人的一个创造。但是“泰山之妙在于登”登山的乐趣不仅在于目标极顶，在真切的攀登之中，历史文化、天人幽思，才会溶入自己的血液，化为充沛的精神气脉。在攀登中，人和自然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山势险峻，路在山谷，道奇且险，但人心平稳，仿佛在泰山的怀抱中亲切地拾级而上，真正体验到“雄而可亲”。人与人之间也显得分外和谐，登山中你少看见愁眉苦脸，即使很累人们也是面带笑容，萍水相逢也亲切地招呼。还有，

就是人的身心之间的和谐，要注意登山强度要和自然肌体的状况相适应，才能尽得其乐。

杨晓华：泰山的高妙还在于，把艰苦的攀登变成了一种审美的过程，甚至是人生过程的一种隐喻。当我了解到您的一生经历的时候，我还明白了，坚韧的攀登，其实一直是您生命的基本状况和体验。

杨辛：对泰山的理解，对攀登的热爱，确实和我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我12岁时父母亲就去世。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住在破庙里。16岁到民生轮船公司做学徒。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搞“疲劳轰炸”，几千人闷死在重庆较场口防空洞，死难者的尸体在朝天门码头上堆积如山。为了打日本鬼子，后来我和中学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印缅远征军。当部队要调往东北打共产党的时候，又和同学逃跑到昆明，受到进步思潮影响参加学生运动。后考入北平艺专上学，又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就投奔冀察热辽解放区，参加革命。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汤用彤先生把我从吉林调到北大，从此就一直在北大教书。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挂黑牌，做过木工、砸煤工。

我的人生确实就像一种艰难而历险的攀登，虽历尽坎坷，始终追求进步和光明。当我以超脱的心境在泰山的怀抱中攀登的时候，当我到达岱顶欣赏人间的无边景色的时候，我的生命更加昂扬和激越。我 90 岁时写下人生感悟：“凭艺术而赞美，登泰山而悟生，赏荷花而好洁，重友谊而贵诚，崇奉献而知乐，爱人民而怀恩。”这是我的人生观，也是我的艺术观。

杨晓华：您对泰山精神的认识和总结，灌注了您美学思想和人生体验。而今，又是什么因素在鼓舞您，以 90 多岁的高龄，执着于弘扬泰山精神？

杨辛：其实，对泰山精神文化的价值的高度认同和推重，非我一人之心。季羨林先生认为泰山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他认为：“泰山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我个人觉得，泰山虽在历史上曾经被视为神山，披上了封建神权和特权的外衣，但在新的时代，

我们要通过批判继承，在新的精神高度对泰山文化加以提炼和概括。

我们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洪钟大吕，激荡人心。就像抗日战争时期《黄河大合唱》用雷霆万钧、奔腾前进的黄河来激励人们的斗志一样，我们现在也需要一种大气磅礴充满阳刚之气的精神文化坐标，来激浊扬清、提振人心、充实魂魄，弘扬主旋律。泰山显造化之神力，聚自然之精华，续古今之文脉，历万古而弥新，其厚重、包容、和谐、坚韧和自强不息，都是当代中国人需要不断砥砺和发扬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都是当代中国需要不断补充的正能量。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荆溪

学者谈读书

田余庆谈《东晋门阀政治》里未能如愿完成的内容

按：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先生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的观点也早已深入人心。时值本书再版，我们约请年届九十高龄的田先生再谈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在田先生看来，并无充分史料证明中国曾出现过西方式的“贵族政治”，即使是东晋门阀政治，也并未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

不无遗憾的是，这次再版时田先生本想增补一章《温峤与江州》，由于健康原因，最后并未如愿完成。此次访谈中我们特别请田先生谈了谈这部分未能问世的内容，希望略补此憾。

上海书评：在最新版的《东晋门阀政治》后题记中，您说本来还要写一章“温峤与江州”。按照您的归类，温峤似乎不是第一流的东晋门阀士族，为什么要加入这一章呢？

田余庆：关于温峤，我初探东晋门阀政治时已有较深印象。以他平庸的条件，过江不久就得到执政诸高门的接纳和信任，平苏峻后立即获取东晋地缘政治中配置给他的江州地盘，这中间必有特殊的理由。只是他在江左生存只有十二年时间，其间居江州之位不过三年，既无众多的宗族部曲相随，更无出色的子嗣继承，所以江州局面未因他的开辟而稳定下来。我留意温峤与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补东晋门阀政治和东晋地缘政治的一点空缺。

上海书评：原来您是从东晋权力格局中的荆扬对立、荆扬平衡的角度来看位处中游的江州，因而关注温峤历史作用的。

田余庆：十年前，我得见“代王猗卢之碑”残拓及柯昌泗题记二则，推断碑为刘琨立于公元316年3月至11月之间。此碑对于两晋政权嬗变极具象征意义。立碑年份也很关键。一、316年，拓跋部败于石勒后一蹶不起，长期龟缩

代北，未豫北方纷争，刘琨则逃奔冀州段部，西晋在中原的旗号不复存在；二、苟安于长安的晋愍帝，同年降于匈奴刘聪，西晋更是名实俱亡，胡、羯完全占有长江以北；三、建康与长安原本是分陕而治的状态，此时司马氏政权在建康独存，为西晋遗臣瞩目，但缺晋朝法统与帝号。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刘琨以他所具西晋所授大将军、司空、都督并幽冀诸州军事的旧日名分，与他在冀州所靠的鲜卑段部段匹磾共同领銜，派遣温峤出使建康劝进，使司马睿称帝获得重要的推动力，温峤从而进入东晋历史舞台。

上海书评：温峤并非一般的避难南渡人士，他是代表西晋末年的重要人物刘琨的，而刘琨的支持与建康朝廷的顺利建立有密切关系。可是，刘琨为什么自己不去建康而要派温峤南行呢？

田余庆：据传刘琨少无令誉，好游权贵之门，习性浮夸，史称“佻巧之徒”。八王之乱之末，他受东海王越之命出督并州，历经艰辛，获得声望。但他观望于长安与建康之间，曾有“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的寓志之句，与琅邪王并无近谊。而建康自永嘉以来，北士逐渐充斥，各据要津，未必看重刘琨。刘琨一心报晋，死前犹有“何意百

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赠卢谡诗，卢谡回答“百炼或致屈，绕指所以伸”，所伸自然是指伸向建康。刘琨屈居段部只有一年，就在段部内斗中被缢死。

上海书评：《晋书》记段氏杀刘琨可能与王敦密使有关，卢谡理刘琨表也反复替刘琨表白对建康并无二心，也许说明刘琨在琅邪王睿与南阳王保之间的观望的确造成了政治波澜。敦煌出邓粲《晋纪》残卷有温峤理刘琨表，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

田余庆：太原温氏本属二流门第，温峤本人又“姿形甚陋”，但以劝进言辞获得称许。他盛赞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亦是谦卑而无所覬觐。他应对进退有度，江左胜流留有一些赠答诗篇可参。他带来的劝进表文由“河朔征镇华夷”一百八十人联署，刘琨、段匹磾领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凸现北方多种势力对建康法统的一致认同。后来，东晋一朝对北政策始终是不与刘、石通使而与鲜卑拓跋、段部等亲近。可以说刘琨、温峤所亲所仇，奠定了东晋一朝对北方各族的基本政策。

上海书评：温峤能够迅速融入南渡群士的上层集团，既有刘琨的背景，也是靠了他自己的才具。在江左的各大政治势力间，他本是一个孤客，但他周旋

于各势力间，不仅能够自存，还颇有成就。

田余庆：温峤与太子（后来的明帝）结深交，对王敦坚决抵抗。王敦叛平后又为受株连的众多党敦朝士吁请宽免，做得周到适度。他反王敦而亲王导，使自己在纷纭的朝局中居于稳定地位，不随朝局而起伏变化。他更显著的功绩是与荆州强人陶侃周旋应对，既不助长陶侃，又能借重陶侃实力，一举歼灭苏峻叛军，挽回东晋大局。朝廷命他都督江州，驻守于扬、荆之间，显然是期望他起上下游的缓冲作用，使江左内部不再重启重大纠纷。他安定了被建康视为异己势力的陶侃，使他终身与建康和平相处。

上海书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江州，就是从温峤开始展露其六朝史意义的吧？

田余庆：以长江一线基地为主导的东晋地缘政治布局，中枢扬州长期在王导之手。下游徐州侨郡县具有拱卫建康的特殊作用，由郗鉴长期稳定经营。温峤刺江州，与郗鉴刺徐州同时，二人处身行事和所起政治作用大有可比之处。只是温不永年，死后江州成为扬、荆两强争夺之地，未能独立发挥作用。稍后，下游扬州之西出现了豫州，扬、豫一体；

上游荆州之北出现了雍州，荆、雍一体。可以看出，江州是上下游必争之地，把温峤配置在江州，是东晋有远见的决策。温峤明白此意，不负所托。他曾有迁都江州之议，而江东豪杰则主迁会稽。迁都不符王氏利益，未得王导认可。温死葬豫章，表明温峤原拟以江州为其家族在南植根之地。后嗣视形势已变，乃迁葬建康今郭家山之地。温峤江州之业无合适的后人继承，自择北来入幕之人，后转手入“驰驱戎马之辈”，与诸门阀不能合辙，这是门阀政治格局所不能容纳的。再后陶侃以荆州之重进占江州，陶侃有谦退之志而无非分之求，死后江州重回门阀政治轨辙。

上海书评：您关注江州，是因为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地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江州是一个新因素。

田余庆：门阀政治，主导者自然是高层门第，是他们与司马皇权共治。门第高下，一般地说靠社会舆论认同，高门则以婚宦壁垒自我保障，但其身份却没有法律的硬性界定，没有按门第高下分配政治权力的正式机制。少数臣僚虽非寒素，但门第却不甚高者，由于特殊机遇，攀升至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温峤、郗鉴。不过他们也不可能入主中枢，因为得不到高门的广泛支持。我从这种现

象感知，建康政权像是一间股份公司，东晋皇帝是名义上的业主，轮流执政的门阀则拥有最大的股权。门第是入股的必要条件，虽非股权大小的唯一依据。陶侃有较强实力，立有大功，但以“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是无从入股的。王导门第最高，与司马氏关系亲近，自然有最大的股份。而温峤、郗鉴门第二流，是靠政治机遇获取股份。他们难得在中枢获利，却能分割地盘，形成东晋的地缘政治格局。他们在地缘政治中各自经营，郗鉴非常成功，温峤具有经营成功的能力，却因不永年而未竟其业。

上海书评：在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中，江州具有什么特殊地位呢？

田余庆：东晋一朝，对付北敌窥伺，守在长江一线及淮、汉地区，以政区分，则是徐、扬、豫、江、荆、雍等州，地缘政治在此区域展开。其中扬、荆二州形成长江流域上游下游两大中心，斗争复杂，现象纷纭。南方腹地诸州，不涉大局，无多可述。温峤所属江州，辖今赣、闽全境及湘境东南隅，地域辽阔。境内流民颇多，有货殖之利。江州土地开发显著，运漕不止供应江州驻军，也供长江沿线尤其是荆、雍军需。闽境粮食循水路输贮江州仓储。荆、江及于交、广，往返及物资运输多循赣水一线，而

少经由湘水。江州腹地发展状况，记载不多，何德章教授论梁陈之际江州土豪势力的兴起，有的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可资参考。唐、宋时期，旧日江州地区经济增长，人才辈出，堪与扬州比肩。回首前尘，温峤的奠基作用值得关注。

上海书评：温峤建议迁都江州，是一时权斗需要，还是别有深虑？

田余庆：江州都督军府置于长江沿线，多在寻阳左近，刺史驻在豫章，既重在军事上链接扬、荆，又关注江州内地发展潜力。这当是温峤请求迁都豫章的理由。只是温峤猝死，江州发展没有由他经营。江州居扬、荆两大之间，先是“驰驱戎马之辈”争夺不已，入陶侃手后经过几年安定局面，转归庾亮。庾氏坐大荆、江，建康的王氏则派出王允之与庾氏相抗衡，争夺江州，引发不少次或明或暗的冲突。谢氏以西府之重曾经插手江州，然后就轮到桓氏一揽荆、江之重了。几十年江州的矛盾斗争，求其嚆矢，还得从温峤算起。

上海书评：从这个角度看，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加入温峤一章，就可以理解了。

田余庆：温峤在古史中已有赞颂。《晋书》列传人物以类相从，置温峤与郗鉴于同卷，为作佳传。郗比温晚死十

年，这十年间经营京口，外抗胡羯，内卫京都，对门阀政治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其人虽不持中枢政柄，但史实钩稽，可见其功勋所在，较早为今日史界认同。温峤其人其事，与郗鉴大同，只是未能在江州营造出如同京口那样的事业，因而在东晋门阀政治中默然无闻。只有过细审读史籍，着眼于大局分析，才能得出像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元无远图，明年短促”条中那样的判断：“诸臣中亦惟温峤有英略而峤又不永年，有以知晋祚之不长。”

上海书评：最近一些魏晋史学者在一些场合谈到，日本的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贵族制理论，而中国学术界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两个层面所作出的唯一回应，迄今为止只有《东晋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魏晋史学界在重大理论上与日本学术传统的一次对话。可是，仅仅从字面上看，《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没有提到贵族制问题，也没有摆出理论探讨的姿态，因此史学界对此书与日本学术传统对话的性质似乎理解不足。请问这一描述是否准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的论述，与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中古的贵族政治理论，确实是各说各话，避开正面交

锋。另有一位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称中国中古政治为寡头政治（Oligarchy），出有专著。我与姜当面对讨论过他的观点，也未多评论。我以为各人写书自有其精到之处，我知之不深，未必能准确品味，还是不多插嘴为好。但是上列观点也确有所不能认同之处，靠口水之争未必能辨识清楚，不如独自表述，听由读者判断。我觉得迄今所知国外学者关于贵族政治的论说，一般不曾从原始资料发掘入手，一步一步推敲，求其演进之迹，而是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史框架，因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

上海书评：您强调门阀政治是汉唐皇权政治之间的一个变态，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质上并不是对皇权政治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政治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的社会与政治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政治与制度仍然富有生机？

田余庆：中外学者论中国贵族政治观点的可酌之处，在我看来，关键是在对专制皇权作用的观察角度不同。古时

候，在大国规模、统一制度的中国国家中，政治纷纭，必需专制皇权驾驭。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之前，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政治。

上海书评：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晋之际的政治，从代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阶级着手，比如曹氏与司马氏。您似乎很早就扬弃了这一思路，比如《袁曹斗争与世家大族》一文。到了《东晋门阀政治》，就有了全新的方法。想请您谈谈该如何理解陈先生那个思路的局限性。

田余庆：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思虑深密，我跟陈先生学术档次隔得太远，想学学不到手。他的创新见解和方法，开辟新路，对他所论述的问题，后来人只是站在他的肩上，才有可能拓展视野，补苴罅漏，难得跳出如来掌心。我写袁曹斗争之文，实际上是承袭了陈先生的

思路而有所发挥，只是那时不敢提陈先生之名，后来才在补注中说出原委。关陇本位之说是一个大学说，贯通北朝隋唐，读过的人都受启发，终身受益。我觉得陈先生未甚留意之处，是在运用其创见解释后代史实时，未尽充分考虑到历史条件的变迁，因而有时显得准确度欠缺一点。如袁曹出身行事的差别，涉及阶级和文化，对三国历史形成影响很大，是创见，很高明。但当曹氏已居皇位，并且已历数世之后，陈先生仍以曹袁出身差异为主要理由，来解释魏晋易代的缘故，就显得隔得远了一点。陈先生以其关陇本位的卓识解释几百年之后的牛李党争，也让人感到其间历史虚线长，缺乏实感，难得丝丝入扣。

细品陈先生的学说，要说歧见，只是觉得陈先生未甚关注之点，是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对这方面的认识，近年读阎步克教授的论著，觉得他比我有深度，我很赞赏。

上海书评：《东晋门阀政治》出版二十多年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专业人士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在当世算得一个罕见的现象。您在《拓跋史探》里考证崔浩史案时，对史学发展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感慨良深。这是不是基于先生的个人经验与观察？

田余庆：对于古史的理论思维，越入老年越能领会宋儒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轻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我不常用“研究”字眼，而好用“探索”来表述自己的工作，这是对历史考察的一种内心感悟，而不只是谦退姿态。谦退自然也是必要的，只有自己最明白自己底气不足之处和藏拙所在，认准自己的智慧不足以全面看清历史，不得不留有余地。

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作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

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还不太敢坚持这种认识，有时还会由于自保而跟风说话。中年以后，才逐渐滋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定力，找到一点不惑的感觉，言语写作尽可能多作理性思维，错误也就少了一些，知道错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认识和改正。

人到这岁数了，新书新论读不进去，实际上是脱离了学术前进的潮流。咀嚼往事，伤时之思多了起来，不过也是随想随忘，要清楚记住是困难的。年轻人问起我的治学经验和对史学的瞻望，我只能瞎聊几句，没多少新鲜话语。其实读史越久，越多有看不懂的问题，靠后面的人接着思考。好在一代胜过一代，新资料新眼界总会产生新认识。

采访人钟鑫，文载 2013 年 1 月 6 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来源：上海书评

没有一本一劳永逸的书

当我成为一名医科大学生后，我进入人一个新的世界。我读了许多医科书。

它们告诉我，人是一架机器，受机械法则的控制，当机器停下来时，人的生命

也就终止了。我在医院里看到人们死去，惊恐之余便相信了书本上所说的东西。我自以为是地相信，宗教和上帝的观念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生存需要而构想出来的，它们在过去一或许现在也是一体现为某种有利于种族生存的价值观，但那只能历史地予以解释而不能视为真实的存在。我虽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但在心灵深处，却把上帝看作是有理智的人必须加以拒绝的一种假设。

然而，要是根本就没有那个把我投入永恒之火的上帝，也根本没有可以被投入永恒之火的灵魂的话，要是我只是机械力量的玩物，生存竞争就是它的推动力，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像人们曾经教导过我的善，到底还有没有意义。我开始读伦理学。我用心啃完一部部令人生畏的巨著。我最后得出结论：做人的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快乐，即使是舍己为人，那也是出于一种幻想，以为自己所要寻求的快乐就是慷慨大方。既然未来是不确定的，及时行乐便是理所当然的常识。我认定，是与非只是两个词，行为准则不过是人们为保护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一种习俗而已。自由的人没有理由非要遵循它们，除非他觉得它们对他并无大碍。那时流行格言，于是我也把自己的信念写成一句格

言，用以自勉：“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是别让警察盯上。”我到24岁时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它以两条原理为基础，即：物的相对性和人的圆周率。后来我才发现，那第一条原理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另一条也许很深刻，只是我现在即使绞尽脑汁，大概到死也不会再想得起来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偶然读到一个小故事，觉得非常有趣。这小故事我是在阿那托尔·法朗士的《文学生涯》的某一卷里读到的。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但至今我还记得，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东方有个年轻国王，登基后一心要把他的王国治理好，就把国内的贤士都召来，命令他们去收集全世界的智识慧言，编成册供他阅读，这样他就能成为世上最英明的君王。贤士们遵命而去。过了三十年。他们牵着一队骆驼回来了，骆驼背上载着五千册书。他们对国王说，这里收录了天下贤士所知道的全部智识慧言。但是，国王正忙于国事，没时间读那么多书，就命令贤士们回去对这些智识慧言加以精选。过了十五年，贤士们回来了，这回他们的骆驼背上只有五百册书。他们禀告国王说，从这五百册书里就可得知天下全部智慧。但是五百册还是太多，因王命令他们回去再作精

选。又过了十年，贤士们又回来了。这回他们带来书不过五十册而已。然而，国王却老了，他疲惫不堪，就是读五十册书的精力也没有。于是他命令贤士们再一次精选，要在一本书里为他提供人类智慧的精华，让他最后能学到他最迫切需要的东西。贤士们奉命而去。又过了五年，他们又回来了。这回他们自己也都成了老年人。他们把那本包含着人类智慧精华的书送到国王手里。然而，这时候的国王已经奄奄一息，就连这一本书也来不及读了。

我想寻找的也是这么一本书一本能使我一劳水逸地解决一切疑问的书。解决了一切疑问，我就可以放手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模式了。我从古典哲学家读到现代哲学家，希望在他们那里能找到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发现他们的言论很不一致。对他们著作中的批判部分，我觉得都很有道理，但读到其中的建设性部分，我虽然说不出有什么问题，却总觉得难以使我心服口服。这些哲学家给我的印象是，尽管他们学识渊博、推理严密、分类精细，但是他们各自持有那样那样的观点，却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而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气质所致。不然的话，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地争论不休，为什么彼此所见如

此不同，差异如此之大。我好像在哪里读到过，费希特曾说，一个人持怎样的哲学观点，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人。我读到这句话后，当时就想，我很可能是在寻找根本没法找到的东西。于是我就想，既然在哲学上并不存在适合于每个人的普遍真理，而只有符合个人气质的真理，那么我只好缩小探索范围，去寻找一个其哲学体系配我胃口的哲学家，一个和我是同一种人的哲学家。他对我的疑问所作的解答一定会使我满意，因为他的解答正好迎合我的气质。有一个时期，我对美国实用主义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我曾读过英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们写的哲学著作，从中并没有得到什么教益。我嫌他们太绅士气，不像是很好的哲学家，甚至还有点怀疑，他们是不是因为社交的缘故，害怕伤了同事的感情而不敢大胆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实用主义哲学家却很有活力。他们生气勃勃，其中最重要的几位文笔也很好。他们写到了我一直没法想通的那些问题，而且写得深入浅出。不过，尽管我很希望相信，却还是不能像他们那样，相信真理就是我们用来达到实用目的的工具。我认为，作为一切知识基础的感性资料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对你来说是否有用，它们总是存在着。此外，他们还说，如果我因

相信上帝的存在而得到了安慰，那么上帝对我来说就是存在的。对这种说法，我也觉得不舒服。最后，实用主义再也不能使我感兴趣了。我觉得读柏格森的书特别有趣，但特别难以让人信服；对本尼台托·克罗齐，我也觉得不合我意。而在另一方面，我却发现伯兰特·罗素写的东西不但清晰易懂而且语言优美，读来使人心旷神怡。我不胜钦慕地读他的书。我很愿意把他当作我所要寻找的向导。他知识广博而且通情达理。对于人的弱点，他很宽容。但我及时发现，他是一个不太明确方向的向导。他的心智游移不定。他就像一个建筑师，当你要想有一所房子住时，他先劝你用砖头来造，接着又向你提出种种理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用石头而不是用砖头来造；而当你同意应该用石头来造后，他又提出同样充足的理由向你证明，唯一可用的材料是钢筋混凝土。最后，你连头顶上的一个顶篷也没有盖起来。我要寻求的是一个首尾一致而且能自圆其说的哲学体系，就像布拉德莱的那样，里面的每一部分都不可分地连接在一起，意志与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改动，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分崩离析。伯兰特·罗素没能给我这样的体系。

最后我得出结论，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一本完整而能使我满意的书，因为这样的书只能是我自己的一种表达。于是我大胆妄为地决定，这本书必须由我自己来写。我找来那些为研究生读哲学学位所规定的必读书，一本本地细心研读。我想这样至少可以使我自己的写作有个基础。我觉得，有了这个基础。加上我四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生活知识(因为我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正好 40 岁)，再加上我准备花几年时间悉心研究一番哲学名著，我将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写出这样一本书来。我知道，这本书除了对我自己。不会有任何价值，至多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的灵魂(因为没有确切的词，姑且这么说)写照，说明这个人的生活经验要比一般职业哲学家丰富一点。我清楚地知道，我在哲学思维方面是毫无天赋可言的，所以我准备从多方面收集理论。这些理论不仅要满足我的心智，而且还要满足(应该说比我的心智更重要的)我整个的本能感情和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即作为一个人那么亲密无间的一部分的偏见，它们很难和本能区分开来。根据这些理论，我将建立一个对我有效、并且能为我指引生活之路的哲学体系。

但我越读越觉得这个课题之复杂，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尤其是那些哲学杂志，更加使我灰心丧气。我在那里看到有些题目显然很重要，而且有长篇论述，但我读起来却像处在一片昏暗之中，只觉得繁琐而茫然。它们那种论述方式和推理过程、对每个论点的精密论证和可能遇到的反面意见的陈述、作者对自己初次使用的术语的界定和随处可见的引经据典，全都在向我证明，哲学——至少是现代哲学——只是专家们之间的事情，门外汉简直休想了解其中

的奥秘。我要写这本书，就需要用二十年时间作准备，然后才能开始写，这样等我写完之际，大概也像阿那托尔·法朗士故事中的国王一样，已经奄奄一息了，而我的这一番辛苦，到那时至少对我来说已不再有什么用处。

于是，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作者：毛姆

来源：《毛姆读书随笔》

■ 好文共赏

再给田老师交篇读书报告吧

记得大一下听阎步克的中国古代史，阎老师说，他之所以选择做制度史，是因为觉得做政治史无论如何也做不过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就是田余庆，而《东晋门阀政治》是他的老师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是一部钩玄索隐、把握大历史进程的史学专著，但其行文流畅，文采斐然，勾勒东晋风流人物纵横捭阖，丝毫不逊于演义小说，是我大一一年读到的写得最漂亮的一本书。

后来为了读田先生那本并不厚的《拓跋史探》，将拓跋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密密麻麻画了好几页，还理了一遍五胡十六国如麻的地理、人物、民族、王朝、征伐与杀戮、权术与阴谋，花了一个寒假的时间。再读《秦汉魏晋史探微》，可惜那些读书笔记都随着上学期笔记的遗失而风流云散了，我也丢了自己的一段历史。然而我依然可以凭借记忆拼凑出当年阅读田余庆时的惊叹与心折，还有感动，真的是感动，并非因为文本煽情，而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书本看

到书桌前那个沉静而笃定的白发先生，用了一生时间去皓首穷经，钩玄索隐，默默挑起历史的重担。

田先生的书为我打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魏晋史，也在我大一最不知所措的时候，用那几卷皇皇巨著安慰了我年轻躁动的心，为我开启了一段奇妙的知识旅程。虽然我在不学无术的新闻专业上愈走愈远，最终也没有勇气修历史学双学位，但我依然愿意攀附田先生为我的一位老师。

今天，愿老师一路走好，给您交一篇读书报告。

—

中国自初，政治与文化就水乳交融，难舍难分。我们习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士人。士人干政，积累了政治力量，背后依附了整个家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士族阶层。士族是文化贵族，与日本的武士，欧洲的封建领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士族政治作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而门阀政

治作为士族政治的顶峰，只存在于东晋一朝。

《东晋门阀政治》梳理了门阀政治百余年的历史脉络。田余庆在自序中说：“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于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皇权政治变态一说，与东洋史学家所谓六朝贵族论大异其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皇权因内耗和外侮而衰弱，自东汉以来积累了政治力量的士族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司马氏，开启了皇权与士族共治的门阀政治。此后，各家门阀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使司马氏皇权得以维持，亦使江左华族得以与北方胡族对峙。但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只是历史的变态，最终，新的政治力量次等士族和流民势力崛起，击败了行将就木的司马氏皇权和因内耗而相对衰弱的门阀士族，承担起重振皇权的历史使命。在这百年中，门阀的相互牵制、江左与北方胡族的抗衡、新政治力量的崛起，都围绕着皇权从衰弱到重振这一内在逻辑。所以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政治形态依然是皇权政治，并不存在如东洋史学家所说的贵族制社会。

这是《东晋门阀政治》的核心思想。

为了更好地看明白这一历史进程，田余庆治史不囿于东晋一朝。他前承西晋，阐释了江左政权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历史渊源；后接南朝，论述南朝的权力结构和门阀士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横向上，对北方政权和南北关系进行了考察，在“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中打通了南北关节，使读者能从更长更广的时空中理解东晋政治制度的皇权政治属性。

门阀政治“来自于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并非无意义的历史循环。从整体上去考察江左社会，无论是具体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文化状况，都有着长足的进步。自古被视为衰乱之世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古代政治形态提供了多种可能，而在这数百年时间中酝酿的制度创新和物质进步，为隋唐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田余庆说：“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第346页）

二

田余庆将门阀政治的存在基础概括为三点：“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这样一个外部条件，都不会有江左百年的门阀政治局面。”

西晋东海王司马越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奠基者，他对东晋政治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江左政权实际上是司马越和地方实力派王衍势力的派生物。西晋末年，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时期，司马睿，也就是后来的晋元帝，是作为司马越集团政治代表被派往江左。

“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形成，标志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东晋门阀政治开始。而“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是司马越与东海世家大族代表王衍的结合，这“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第7页）司马越作为宗王为王衍提供政治舞台，而王衍则为司马越笼络名士，与地方势力融合。但这里的“王与马”体系中，司马氏掌握了权力重心，司马越代表了宗王势力，是皇权的延伸，所以在这一时期皇权政治仍占主导地位。而到了东晋元帝时期，政治形态发生深刻的变化。永嘉之乱后，作为晋室子遗的

司马睿得登大宝，但“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琊王导。”（第16页）

三

门阀政治作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却得以存续百年之久，主要得益于门阀士族内部、门阀与皇权之间、门阀政治与整个社会基础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关系。

虽然在门阀政治的各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士族能把持朝政，凌驾皇权。但并没有一家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彻底破坏门阀之间的均势。田余庆在“庾、王江州之争”一节中层分缕析地阐述了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之间的斗争，双方都是相对克制的，并没有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门阀均势大框架的制约。

这里必须论及郗鉴在门阀均势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高平郗氏是本书六家门阀士族中唯一没有入主中枢的。郗鉴本人也一度被史学家忽视，在某些史论中，将郗鉴与刘隗、刁协、温峤之流归为一类。而田余庆独具慧眼，以较大篇幅论述了郗鉴的历史价值。在《论郗鉴》一章中，田余庆从郗鉴引流民帅平定王敦叛乱、郗鉴在门阀斗争中斡旋、郗鉴与京口重镇形成三个方面论述了郗

鉴的历史功绩，这里我们重点关注第二部分。郗鉴经营京口，依托自身实力，“处其利而无心”，却一力维持门阀之间的平衡，他坚决反对陶侃废王导之谋，避免了朝政动荡，维持了政局的稳定；后庾亮谋划起兵废王导，此时王导依托武人、降将积累了军事力量，而郗鉴坚决反对，阻遏了内战的爆发。田余庆认为：“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得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第96页），“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覬觐，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第99页）

不仅当权大族之间存在妥协，侨姓士族与江南士族之间也存在妥协。在江左政权建立之前，江南士族名士曾物色陈敏作为江左统治者。但陈敏企图独霸江东，最终在司马越和南士的联合打击下被消灭。所以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侨姓士族渡江后，在巩固自身势力的同时，注重笼络江南士族。江南士族希冀在战乱中保全家族势力，侨姓士族则能够为江左提供这样的庇护，双方各取其利。然而，江南士族的政治地位始终不及侨姓士族，他们也不可能掌握中枢。其始终处于侨姓士族的保护和压制之下。

侨姓士族能够在江左立足，一方面是因为其势力压倒了江南士族，另一方面是由于司马睿是晋室子遗，江左是西晋故土，门阀士族只有拥立司马氏才能名正言顺地入主江左。这里就涉及门阀与皇权的关系。

如祝总斌所述，门阀士族既“尊奉皇权”，又“控制皇权”。门阀士族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时才有力量与皇权平行，乃至“控制皇权”。所以门阀之凌驾皇权，是一种集体式的凌驾。而它们以个体面目出现时，却借“尊奉皇权”为名相互掣肘，所以单个门阀的势力是不稳定的，因此东晋一朝权力核心更替频繁。

从王敦两次起兵可以清晰地看到门阀士族之间的默契与冲突。当晋元帝借刘隗、刁协等之力伸张皇权，打击门阀之时，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得到了侨姓士族和部分江南士族的默认许可。

而王敦第二次起兵则不同，其意在颠覆司马氏政权，这就触及了门阀政治的存续条件之一，虽然得到身在中枢的王导的默认，却遭到其他士族的反对，最终郗鉴引流民帅平息了叛乱。

门阀对皇权的尊崇是利益博弈的结果，而非门阀士族的初衷。在颀颀中，门阀士族走向衰微，皇权正朔思想也逐

渐淡化。然而与此同时，南北矛盾却未缓和。所以当刘裕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维持了所谓的华夏文明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已经具备了取东晋政权而代之的社会舆论基础。刘宋代晋，并没有遭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抗，一方面是因为门阀势力的衰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华夷之辨超越了皇权更代。

四

田余庆认为，民族矛盾尖锐的外部因素也是门阀政治存续的条件之一。东晋政权本身就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一条件，“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第 343 页）王敦之乱和桓玄之乱之间，门阀士族内部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除了郗鉴等人的斡旋，更重要的原因是北方强敌的威胁。因此，门阀士族的内耗没有以频繁内战的形式上演。门阀士族必须寻找一个形式上的核心整合各自的力量与北方抗衡，而这个核心就是司马氏，所以门阀士族并不敢轻易篡晋。而南士则依赖于晋室的庇护，所以只能与侨姓士族妥协以保全家族势力。整个江左社会都无法回避北方强敌环伺这一客观事实，而东晋政权存在的目的，除了统治江左，从名义上来说，还要匡复中原——虽然晋室并未真正以中原为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民族关系相关的活动成为重要的政治筹码。淝水之战使陈郡谢氏的势力达到顶峰。而桓温的三次北伐则使谯郡桓氏崛起并最终掌握中枢。刘裕代司马氏称帝，也是建立在北伐功绩的基础上的。

而门阀士族之间的斗争也藉北伐或北防之名展开，如荆扬之争中，双方都以抗击北方入侵的名义增强军事力量。但门阀士族扬言北伐，多是政治手腕而无实际行动。田余庆看问题非常透彻，他说：“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手段，因而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第 35 页）

实际上，门阀士族利用北伐的名义造势的同时，北伐却受制于门阀政治。祖逖北伐时，士族忌惮其功高震主，对其多方掣肘。田余庆评价桓温北伐时说：“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第 184 页）“广泛的支持”自然包括其他士族的支持，桓温若北伐成功，则会打破门阀内部的均势，所以受到或明或暗的抵制。

“广泛的支持”还包括人民的支持。虽然此时北方存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但江左政权偏安犹可，若要匡复中原是绝无可能的，所以北伐的意义仅在于以攻为守，却造成生灵涂炭。人民安居江左，对北伐的热情已经被逐渐消耗。抛开狭隘的民族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进步是超越南方的，事实上，历史也最终选择了北方。所以，北伐的历史价值有限。

顺便说，田余庆钩玄索隐的功力在“桓温先世猜测”一节中淋漓尽致。田余庆注意桓氏世系紊乱，他从桓温先祖桓荣以下第六世孙名讳阙如着手，依托各种零碎的史料和逻辑推演，得出桓温是曹马之争后被司马氏诛杀的桓范的后人的结论。

五

北伐成就了刘裕，而刘裕最终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第 278 页）可以说，南北矛盾间接促成了门阀政治的终结。田余庆将刘裕等北府兵将领，和利用道术组织农民起义的孙恩、卢循等人统一划分为次等士族，与门阀士族相区别。次等士族的来源不一，刘裕和孙恩分属北府兵将领和晚渡侨人两支。他们的根基也不同，刘裕依托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孙恩则利用道术组织三吴农

民。但他们都曾依附于门阀士族，北府兵曾是门阀掌握的一支军事力量，而孙恩等则以道术寻求门阀宠幸，寻找政治出路，但他们最终走向了“反对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反对门阀政治”（第 310 页）的道路。可见，虽然门阀士族的力量还较为强大，但其内核——门阀政治制度业已腐朽，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门阀政治开始走向谢幕。

孙恩等人起事，标志着东晋主要的政治力量（以周勰为代表的江南士族、以王敦和桓玄为代表的门阀士族、以祖约苏峻为代表的流民、孙恩卢循领导的中下层贫民）都完成了冲击门阀政治的尝试。

田余庆认为：“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第 311 页）而皇权重振的进程却在刘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东晋最后一个当权的门阀士族太原王氏不再掌握军权，士族专兵已成明日黄花。太原王氏的两支分别依附于皇权（孝武帝司马曜）和相权（会稽王司马道子），丧失了门阀士族的独立性和凌驾皇权的基础。而太原王氏两支的公开倾轧则加剧了门阀士族的内耗。皇权重振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力图振兴的皇权不可能在业已腐朽的司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兴”（第 244 页）而历史将

终结门阀政治的使命赋予了次等士族刘裕。

东晋门阀政治兴于琅琊王氏，讫于太原王氏，历史经过一个循环又回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只是此时已成了“共失天下”。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至此走向微妙的收笔。

来源：“不阅即焚”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号：byjf1898）

作者：南柯太守

史苑钩沉

精神寻梦在北大：老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六）

故事之二十四：曾在北大旁听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

冯雪峰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在 20 年代曾在北大旁听。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寓言作家；领导过“左联”的各种活动；与鲁迅有不寻常的关系；并且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家。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吕克玉、成文英、何丹仁等，义乌人。1921 年 10 月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曾与潘漠华等组织文学团体晨光社，主办《晨光》旬刊。1922 年又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组织湖畔诗社，合出诗集《湖畔》，被称为湖畔诗人。次年 12 月又与潘漠华、应修人合出诗集《春的歌集》。1925 年到北京，曾到北大旁听，1926 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192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12 月，在上海通过柔石介绍，认识鲁迅，筹办《萌芽》月刊，并与鲁迅共同编辑《科学艺术论丛书》，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先

后译有苏联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卡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等书，1929 年 10 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工作。1931 年任左联的党团书记，负责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曾在鲁迅协助下秘密编辑出版《前哨》杂志。1932 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33 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同年年底到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红军大学和党校工作。1936 年春，奉派上海，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曾向鲁迅传达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同年 10 月，主持鲁迅的丧事。后来写有不少有关鲁迅的重要著作。1939 年任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41 年皖南事变时被捕，在上饶集中营关押近二年。建国后，历

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协会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1958年被错划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6年月31日逝世。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解放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论文集》（第一卷）、《回忆鲁迅》、《雪峰寓言》、《寓言》及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等。此外还长期主持《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

故事之二十五：曾在北大旁听的孙氏兄弟——孙伏园和孙福熙

中国现代文坛与新闻界著名的孙氏兄弟——孙伏园和孙福熙，与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是绍兴同乡，在周氏兄弟的帮忙下，皆曾在北大旁听，而后成名。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编辑。曾在北京大学旁听，两度成为鲁迅的学生。1912年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人称“副刊大王”。鲁迅名作《阿Q正传》即在该报首次连续发表。后又应邀主编《京报》副刊。1927年3月，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至冬回上海，创办嚶嚶书屋，出版《贡献》半月刊。

1928年主编《当代》，旋即赴法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中外出版社社长。1939年3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兼《士兵月报》社社长，齐鲁大学国文系主任，大竹乡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1945年去成都，先后在华西大学和铭贤学院任教，同时主编成都《新民报》。

建国后，孙伏园被任命为政务院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其著作主要有《伏园游记》与《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福熙(1898.9.13-1972.6.2)字春苔，浙江绍兴人。1912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小学任教。1919年与其兄孙伏园一起到北京，经鲁迅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常得到李大创、鲁迅等人指导，同时在北大旁听。次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考入法国国立美术专科学校。1925年回国后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山野掇拾》，1926年至1927年任北新书局编辑，出版散文集《归航》、《北京乎》、《春城》。

1928年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任教授。1930年再度赴法，在巴黎大学选修文学和艺术理论。次年回国继续在该校任教，同时编辑《艺风》、《文艺茶话》杂志。1937年到武汉，加入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返回家乡在中学任课。不久到昆明任友仁难童学校当校长。1946年从昆明回到上海，以卖画为生。1948年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解放后任上海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研究会主席。1951年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任高级编辑。1956年到西北参观，创作了散文集《早看西北》。晚年在张家口艺术学院任教，并兼任北京编译社高级编辑。

故事之二十六：曾在北大旁听的新闻巨子—成舍我

成舍我，系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报刊出版家、新闻教育家。原名成勋，后名成平。笔名大衷、百忧。湖南湘乡人。1898年7月生。青年时代就学于安徽省安庆第四公学，课余为当地《长江报》等报刊写稿。1915年到奉天(今沈阳)，在《健报》任校对、编辑。1916年入上海《民国日报》(上海)，任要闻及副刊编辑。1917年发起筹办上海记者俱乐部，并参加柳亚子、陈去病等主持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任《太平洋》杂志助理编辑。1918年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课余在《益世报》北京版任主笔、采访主任、总编辑，并试办小型报纸《真报》。1924年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

以消息迅速受到欢迎。1925年增出《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并在北京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为三报培养初级人才。1926年曾被奉系军阀逮捕。1927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民生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一度被拘。1935年到上海创办小型日报《立报》。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聘为国民参政员。1942年在桂林恢复世界新闻专科学校。1945年在重庆出版《世界日报》。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北平(今北京)，复刊《立报》和《世界日报》。1947年当选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移居香港。1952年去台湾，在台北各大学任教。1956年后，主要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任该校校长及世界书局董事长。1988年台湾当局解除报禁后，申请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

成舍我从事新闻工作近80年，在评论写作、报业经营管理和新闻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中国新闻界和1949年以后的台湾新闻界有较高的声望和影响。

故事之二十七：《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在北大旁听前后

著名作家杨沫，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

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她在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的创作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生活的影子。她原名杨成业，1914年8月25日生于北京。她的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她因父母不和，只能独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

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把眼界从小家庭放进了大世界。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

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成长为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缚，渴望到广阔天地里飞翔。可是玄是个“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骜不驯，不会阿谀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共产党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是真挚的，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

期的创作。《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的生活和学习成为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她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我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故事之二十八：旁听成就了北大名教授—金克木

我国著名梵语学家、北大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著名教授金克木，年轻时曾在北大旁听和北大图书馆供职，半工半读，最后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学者。金克木生于1912年，安徽寿县人，

1941年赴印度留学，1946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194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是第三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他多年来致力于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2001年8月5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8岁。他于1933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他在《末班车》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回忆了他在北大旁听的经历：“我还搭过另一次末班车，但不是火车，也不是汽车，是在北京沙滩红楼的北京外国文学系的法文组。

话说蔡元培一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就对原来的这所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改革之一便是扩大外语系科。据说他创办了八个外国语的系。第八种是世界语。”“到1933年，这几个组都只剩下最后的班级，也就是末班车，是无票乘车者，不是学生。这个班上只有一个人，因此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这在北大文学院已成惯例，从来不点名查学生证。当时德文组教授中有翻译《牡丹亭》的德国诗人洪涛生，毕业生中有诗人冯

至。尽管如此，也只有几个学生上课。我去听过一次洪涛生教授讲莱辛寓言。他自己到德文图书室去打字，打出一页课文，将复写纸印出的分发给学生，也给我一份，没问一句话。

日文组的教授有周作人、钱稻孙、徐祖正三位专家。学生也不多，其中一个周作人的儿子。法文组的原来系主任是梁宗岱教授。他教毕业班，也只有几个学生，内含两个女生。他不去教室，在法文组图书室上课。师生围在长方桌周围，用法文闲聊天。要查什么书就随手在书架上拿。主讲人是梁教授，总题目是法国文学。他讲的法文中夹杂着中文、英文、德文的诗句原文，大家嘻嘻哈哈，也没有课本和讲义。我去听过一次，大家看到我仿佛见到原有的学生。另有两位外国教员，一位是瑞士人斐安理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最后成为日内瓦大学索绪尔以后语言学的第三代。他在中国时还很年轻，留起小胡子冒充老。他开过语言学课没人听，停了。随后到日本东京去才教语言学，我听他的课是法国戏剧。另一位是邵可偈教授，法国人。他的家世辉煌，祖父和伯祖父是学者兼革命者，一位是地理学家，一位是巴黎公社社员。他父亲是中学校长。他承袭了这个姓名，并未承袭家学，而由

吴克刚教授（和巴金同译《克鲁泡特金传》的）介绍到劳动大学教法文。他到南京中央大学教法文，编了一本《近代法国文选》，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他到北京大学法文组，兼教文学院一年级法文。他曾写信给蔡元培，反对将法、德、俄文等组取消合并入英语系。蔡有复信表示无力挽回。抗战时他在云南大学，战后在燕京大学。战时他随戴高乐将军抗纳粹德国。1949年回法国。不久前，他的孙女儿从法国到德国来，还看过我。我才知道他已在高龄去世。

现在我搭上人生的末班车，回想1933年去沙滩北大法文组当末班车的无票乘客，从此与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然而说来很惭愧，对于外国文，我纯粹是个实用主义者，不用就忘，可以说是一生与外文作游戏。若不信，请听我道来。””正好另一个朋友是‘北大谜’，极力鼓吹我去沙滩和他同住，同到北大旁听课。由此我去上邵可偈教的一年级大班，学发音。我拿他编的《文选》去问他，他立刻让我去法文组听他的二年级课。我的那位送我法文自修书的朋友本在日本留学，‘九一八’后愤而回国，不料忽然被捕。我不知道他已入狱，夜间还去访他。幸亏在大门口望见室内无灯，没有进大门，免受牵

连。我把这事告诉邵可侣，说要搬家。他立刻建议我到 he 家里住。他是一个人住一所四合院，只有做饭的大师傅同住。他自己住北房，让我住门口的南房，家具也归我用，不收房租，不管饭吃，要我在他假期旅游时替他看房子，有中文信件帮他处理，作为交换。住下后才知道，原先有一位教授和他同住，结婚搬走了，我是顶替他的。我除看房子外还为他校再版的《文选》校样，整理并校订他的讲义成为《大学初级法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提议我也署一个名字。我认为不妥，说是只要在他的法文序中提到我就行了。想不到的是，英译中国现代诗，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的陈世骧 1939 年在湖南大学教英文，他推荐我到湖南大学文学院临时应急补缺法文的主要依据，就是这课本和这篇序。在邵可侣的热心联络下，有些法国人互相请客开茶会，留学法国的中国人也参加，有的教授还带了学生去。嫁给中国人的法国妇女也有随丈夫参加的。不定期，也没有固定的地点和人数，有

人是常客，有人偶然来。有人虽收通知却从不参加，例如美国人温德教授。会上人人用法文闲谈。有时青年男女作点小游戏或朗诵诗，弹琴，唱歌。最热闹时还排练过法文戏《青鸟》。

我和邵先生同住一处以后，他便把这件事也交给我，由我发通知联系。别人请客也找我。由此我认识了一些与法文有关的中外老中青人士，包括过路的外国男女。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只到过一次会，由于谈诗和作旧体诗而和我熟悉起来。1946 年，我由印度回国，友人曹未风告知我写信给吴先生。吴先生向武汉大学推荐我，由文学院院长刘永济教授安排聘我到哲学系任教授，教印度哲学和梵文。我搭上法文组的末班车，竟成为我教大学的头班车，真是料想不到的。”

作者：柳哲

来源：新华网

■ 大美北大

镜春园和朗润园今昔



未名湖往北，就是镜春园和朗润园，北大人称作“后湖”的区域。90年代，北大对外开放，未名湖畔游人熙熙攘攘，而与之毗邻的后湖区域却依然保持着宁静。其实，无论对于游人，还是对于北大学生来说，后湖区域都是一个不会轻易涉足的所在，一方面是因为它主要用作北大教工的居住区，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并不拥有未名湖那样绮丽的风光。近日，北京大学公示了将对镜春园、朗润园区域内的平房进行拆迁并兴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决策，一时间，

造访后湖区域的人多了起来。人们关注着这两座清代园林的命运，更关切园里人的命运。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两座园林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希望人们不要太忧虑它们的将来。

一、镜春园和朗润园的历史更迭

现在北大校园内的镜春园，原是乾隆年间从淑春园中划分出来的，最初叫做春熙院。后来春熙院又被分作东西两部，东部较小，嘉庆七年（1802）赐给了嘉庆帝第四女庄静公主，改称镜春园。

大约与此同时或在此后不久，春熙院西部又赐给了嘉庆帝第五子绵愉。这就是鸣鹤园。鸣鹤园的面积要比镜春园大五、六倍。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镜春园又并于鸣鹤园。因此，校园中现在的镜春园，其实应该叫做鸣鹤园。同治三年（1864）绵愉去世之后，鸣鹤园仍为他的后人所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鸣鹤园也遭到了破坏。民国初年，曾经作过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岁额四百元向当时的紫禁城“小朝廷”租下了鸣鹤园和镜春园。他大量拆毁了园里最好的建筑物，并把拆下来的好材料运往河南卫辉原籍去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燕京大学以淑春园旧址为中心开始建校时，现在的镜春园（即当时的鸣鹤园）仍属徐世昌所有。直到新中国成立院系合并之后，镜春园才得以并入北大校园。

朗润园原名春和园，清嘉庆年间为乾隆第十七子永璘的赐园。道光末年，春和园转赐奕訢，始改称朗润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訢去世，朗润园收回由内务府管理，用作内阁军机处及诸大臣会议的地方。民国初年，徐世昌以租用为名拆毁鸣鹤园引起了紫禁城“小

朝廷”的戒心，于是朗润园被赏给了奕譞的第七子载涛作为私产。载涛便是朗润园合并为校园之前的最后一个园主。³

二、镜春园、朗润园景观格局的变迁

清代的镜春园和朗润园，山水如画，景物怡人，两座园林的得名也与水相关。从金勋所藏《鸣鹤园镜春园地盘画样全图》来看，镜春园的主要建筑区四周有水道环绕，略成圆形，很象一面镜子，“镜春园”也许就是因此而得名的。昔日的朗润园，殿宇四周环河，因为有水，才能“朗润”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镜春园、朗润园一带山水风景的地理基础吧。蜿蜒于未名湖南部低地边缘的海拔 46 米等高线，大约把校园本部划分为南北两半，此线以南，地形逐渐上升，到了南墙以内的学生宿舍区，平均海拔在 50 米左右；此线以北，地形则平缓下降，到了朗润园的北部，平均海拔已经降低到 45 米以下。这一带低地有着非常丰富的地下水溢出地面，引水造园十分方便。而且，最重要的天然水源都分布在海拔 50 米上下的高程上，如玉泉山麓的裂隙泉、万泉庄旁的平地泉。这样，处于海拔 46 米以下的镜春园、朗润园区域，引水造园就有了可能。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与镜春园、朗润园风景塑造密切相关的水源与河流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北京市地下水逐年下降，泉源与自流井日趋枯竭，西校门内的自流井已很少出水；另外，由于河流改道，旧日水渠也渐渐湮废，校外新开的万泉河，中间一段裁弯取直，已不再经过旧日篓兜桥的旁边。去年，镜春园和朗润园就没有水了，不过夏天雨后还可算作泥塘，还有荷花。现在，初春的湖底尽是枯叶和杂草，还有猫咪在奔跑。没有了水的园林，就象人没有了眼睛。

园中水系的日渐枯竭，使这两座园林的自然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两座园林中清代的建筑绝大多数已经湮没无存，今日我们所见的园中建筑已经迥异乎昔日了。

上文我们提到，现在的镜春园其实是清代的鸣鹤园。清代鸣鹤园仅存的建筑遗物只有校景亭与亭西白石砌岸的鱼池了。校景亭屹立在红湖西南角的小土丘上，原名翼然亭，重檐攒尖，朴实庄重，曾一度重修并彩绘有燕园校景，因此更名为校景亭。鱼池中央立着太湖石，已经没有水了。

清代鸣鹤园主要的建筑区，称作“东所”。此外还有“中所”和“西

所”。“东所”即今天的镜春园 75 号，以前曾是中文系王瑶先生的故居，现在是“北大校友会”所在地。“中所”就是现在的镜春园 79 号院，以前曾住过北大经济系的陈岱孙先生，目前仍为民居，院门还依稀存有旧貌。“西所”旧址则在今红湖西南岸上。

从第一体育馆北端通向朗润园的大路迤东的地方即清代的镜春园。清代镜春园的主要建筑集中在现今挂牌为“北大木工厂”、“北京海淀未名木器加工厂”的地方。这里四周原有水道环绕，现在只有西面的小湖有水，而小湖中的水已经秽浊不堪了。

如今作为校园一部分的朗润园，较之旧日的朗润园，从建筑上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962 年，在东北湖滨一带兴建了北大教工公寓（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公寓）和北招待所。季羨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都曾居住在朗润园，人称“朗润园四老”。据说，北招待所夏天的时候会摆出露天的小吃摊。朗润园中原有殿宇，分中、东、西三所。西所即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所和东所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两个研究中心建筑的修复与修缮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的肯定。

此外，镜春园和朗润园中还大量存在大量唐山大地震后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破坏了园林原有的景观和建筑格局。

三、镜春园、朗润园的改造

看过了现在的镜春园和朗润园，你就会同意久居在朗润园中的季羨林先生将它们比作“校中村”的说法了，虽然它们骨子里依旧是很美的。难道镜春园和朗润园的前程就这样黯淡下去？

终于，北大有所行动了。北大准备在镜春园、朗润园区域新建“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同时也计划对这一区域进行拆迁整治，北大提出的整治镜春园和朗润园要达到的五项基本目标是：首先，拆除园内私自搭建的简陋住房；其次，改造园内老旧的非文物用房，这就将一些解放后修建的品质较好的非文物用房

如全斋包括在内；第三，修缮、修复园内的文物建筑；第四，疏通水道，引水入园；第五，改善包括排水、消防之类的基础设施。改造的同时，园区原有的古建筑、古树都会得到保护，以期最终能够还原历史风貌，重现古典园林，使之成为环境优雅的风景区和科研区。

从 1986 年遵循燕大时期的规划兴建而成的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到数年前利用朗润园的古建筑兴建的“万众苑”（即上文提到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再到修复后的朗润园西所（即上文提到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所在），北大已经积累了多年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镜春园和朗润园会有一个明媚的未来。

作者：孙俊

学员心声

千里追寻，只为杜鹃花开

日历的扉页刚翻到四月天，就无法抵挡春日的诱惑。趁着大好春光，趁着还了无牵挂，游玩的心就无时不喷薄着生机。其实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一直拥有的都是一颗悸动的心，只是境遇不同罢了。

对于游玩，似乎有着天生的癖好和精神的动力。尽管偶是一个游玩发烧友，可某人却十足宅男一个，对于游玩提不起太多的兴趣，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吃饭睡觉呆家里是极好的……不过，让我倍感欣慰的就是，他们班组领头人可是资深驴友一枚，常见活动发起。而某人的工作性质还有种种的夹杂却不凑巧地造成了一次次的错过，遗憾地错过了之前太多的活动。而这次则成了我饱含期待中即将实现的驴行。

早晨将近九点，在等待中终于候来了下了夜班风尘仆仆自梅山而来的某人，以及一干人等，就这样我们从宁波东进入了驶往温岭的高速路。在谈笑风生中，经过奉化，然后仿佛不一会就来到了宁海服务区。这恐怕也是我第一次

在宁海境内短暂逗留。（PS：宁海是我宁波下辖领地内唯一留有遗憾未曾游玩过的地方）大巴继续载着我们前行，下一站经过了台州临海。不过倒霉的是在下这个高速之后，车子开始跟随前车无奈的龟速前进，好一会儿才摆脱这种窘境。可真是好事多磨，进入温岭之后不小心大巴又开错了道，经过一番研究重新上路却迷一样的把我们放在乐清的一个路边了……正当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不是温岭吗咋跑乐清了，不会又开错吧？！领队开路问询后得知进村路线已经对大巴车交通管制了！许是上保山的杜鹃花太出名了。

无奈之下，下车收拾行囊准备 11 路前进。此时已然 12 点半，不过大家还不曾吃饭路途又实在遥远，领队叫了几辆当地的残疾车。然后我们一行三十几人分乘六辆急急上路了，话说这车也是 n 多年不坐，又挤得大多是年轻力壮小伙，拥挤自不必多说，而我则缩在某人腿上熬过了那段山路，车子一辆辆地在踉踉跄跄中前行。一路上我们还和师傅攀谈

了几句才知道这地方是台州温州两市交界处呢，沿路上有不少警察在执行，上午尚可直行的一条进村要道被拦截了，我们只得绕道而行，这杜鹃花之热可见一斑。待到进山入口处，已是密密麻麻地人流车流外加各种当地小摊比比皆是。大家再次集合向山上进发，山路稍显陡峻并不好走，在三分之一处找了个略显开阔的空地，一群人开始搭伙煮年糕汤喽！在饥肠辘辘后第一次在野外品尝这样的年糕汤，别有一番风味！酒足饭饱，我们仍不忘环保驴行带上餐后垃圾，又收拾行囊开始向顶端进发了。走过一级又一级的石阶，疲累开始渐渐袭来，相互鼓励继续前行，一路上石头还给我们这些孩纸们普及了些许野生植物常识。慢慢地，路上开始不经意地闪现杜鹃花美丽的身影，还有紫藤萝瀑布般垂挂。停下脚步，放眼望向山下，在树丛的间隙还能瞄到山下村庄美丽的倩影，心情也跟着轻松愉快起来。走过山上的一个休息亭继续拾级而上，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铁质搭建的台阶。仿佛柳暗花明般豁然开朗的美景，霎时展露眼前。停下脚步，不由自主地开始捕捉这一幕幕的美景。那里已能欣赏到很多美丽无比的杜鹃花生长于悬崖之上，极目远眺则是另有一番景致的山村美

景，恬淡而不是失优雅。登顶之后，眼见同为一饱眼福，熙熙攘攘的人群。视觉的饕餮盛宴才是最震撼我们的，那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啊，蔚为壮观！没有白居易“最惜杜鹃花烂漫，春风吹尽不同攀。”的遗憾，而此刻还有爱人相伴，共同欣赏这一众美景，呼吸这清新的空气，这是何等幸福之事。

不过，总有那么些不堪入目的破相。美丽的杜鹃海中还映衬着一汪清泉般的小水库，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美景，而之旁却醒目地响起机车的轰鸣声，随之而来的是花丛中人为被撵出来的几道“伤痕”！此时红艳之花仿佛又有杜鹃啼血的悲怆。殊不知这些个人为何要用这种方式踏上这座美丽的山顶，来表现他们并不娴熟略显粗糙的所谓特技……而某些游人随意丢弃的垃圾散落丛间，也如此不和谐地破坏着它本该拥有的美丽。时间总毫不留情地飞逝，享受山风吹拂感受美景洗目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从山的另一侧开始移步往下走，上山虽易，下山不易，且慢且注意。虽然速度上要快不少，但是下山时膝盖、腿所承受的力量更甚，一不小心就会踉跄滑到，于是我们需要更谨慎地走着每一步。当然下山的风景依然给力，奉献给我们另外的夕照滩涂风景。临近山脚还能看

到荒废了的山中石屋，依稀在诉说着历史的风霜。欢声笑语地中完成了又一次爬山赏景的过程，而其中让我格外留意的还有众多孩子矫健的身影，也许是我们老了，抑或是长时缺乏的锻炼，比之孩童，我们似乎失去太多的活力。

回大巴车的路上又发生了令人捧腹的插曲，我们在山脚拦的那辆残疾车居然发动了很久还不能启动（许是男生们都太大块了），别人的车早已离去，我

们只好 11 路走了一段路。大巴载着我们进入温岭的大溪镇美食城品尝了当地的美食晚餐，然后一群人心满意足地踏上了返程，车抵宁波已近十点，却忘不了回味记不得疲累！

作者：李石燕

宁波电大汉语言文学 2013 秋